



毒蘋果札記

文/施善繼

一. 二零一零·一·八·利他主義的典範

一九三六年生於廣東開平，唐文標在他36歲上的一九七二年，受聘台大數學系的教席，直至一九八五年在台中病逝。他生命中最後的十三年在台灣度過，他的一生49歲，49分之13，約三分之一強，不能算長，他將所知所學傾囊盡出，甚至包括他個人勞動換取的報酬，他以之仗義疏財，並且默默舉動不欲人知，取之於台灣用之於台灣（非取之於台灣也用之於台灣）無愧於斯士斯民。他的俠義之氣柔情之風，要言之當代台灣無人能及。人們在馬恩合著的《宣言》裡讀到何為利己主義，恰恰相反，人們在與唐文標的交往互動中親暱感知何為利他主義，既真且善殷切的利他主義在唐文標生活於台灣的這十三年裡頭，凡唐文標走過必留下自稱唐某利他主義的痕跡。

他在臨終的病榻上寫下「朋友們，國家留給你們了！」。他實際並非去了天國，他曾經在《天國不是我們的》那一冊書的扉頁，自行題辭「先尋求你的衣食／然後你才看見你的天國」。今年是唐文標物故的第25週年，邱守榕大姊與他們的兒子出生於1983年的唐宏人先生，慷慨大方把唐文標遺存的文物千餘件悉數捐贈給新竹清華大學。他死於台灣，無時無刻與台灣同在。

二. 二零一零·二·十二·愛斗如己

難得梵谷有一位對他極其傾心的弟弟，來自弟弟物質與心靈的雙重慰藉，使他雖形單影隻孑孓於世上頹涼，尚不至完全失溫了無暖意。不幸弟弟比哥哥命舛，梵谷自戕方滿半載，西奧立即隨之奔赴黃昏，多年後詠歌手足之情的後人把西奧遺體移葬梵谷墓旁，兄弟碑石比肩親密，可梵谷生前卻似乎從未動過半絲畫念，為西奧身影入筆，飽飽漲執意毫不遲疑給自己留下，幾近四十幅油畫自畫像，在古今畫家中，他顯然將以這個豐滿的數據，超群絕倫。



孜孜不倦深邃凝思自我，眼珠的顏色隨著季節而變換。其中神形各異的六幅，唇齒之間悠悠然咬含著六款，奕奕生姿的各式煙斗。一八八八年年末割耳情事發生後，畫於一八八九一年一月間兩幅自畫像裡的第一幅，儘管繃帶包裹著右耳，梵谷身裹尚待脫卸的厚重冬衣頭罩絨帽，若無其事，嘴巴尋常銜著一支煙斗，斗口的煙絲正通紅燃燒，煙圈瀾漫繚繞，在畫面的右方向上裊裊。

酷嗜煙斗的癡客，也大都會痴迷於煙斗千姿百態的蒐集。梵谷銜著煙斗六度出現在自畫像裡，畫於巴黎四幅；一八八六年春季兩幅，一八八七年年年初及夏季各一。畫於阿爾勒兩幅；一八八八年八月一幅，一八八九年一月一幅。美好的告訴了觀眾，畫家在世時，的確擁有此項唯我獨尊的癖喜。然而梵谷僅僅藏有煙斗六支？答案當然絕對不只。他分別畫於一八八四、一八八五、一八八九的三幅「靜物」裡，三型形狀不一的煙斗，橫躺斜臥在日常生活周遭的必需品，諸如咖啡豆研磨機、草帽、洋蔥、煙絲罐以及封蠟等等物件的緊鄰，隨時伸手即可觸及。

一八八八年十二月，在阿爾勒畫的「文生椅上的煙斗」，可以清楚看到除了煙斗，椅子邊緣同時放置著與煙斗相關的配件用品。這把椅子，係他一再重複畫了四幅「臥室」連作的第二幅，（第一幅一八八八年十月畫在信裡的墨水素描，第三/第四幅一八八九年九月在聖荷美回想「阿爾勒臥室」的記憶畫），即一八八八年十月那一幅在「阿爾勒臥室」畫中床頭椅子的近景放大特寫。如果細微端詳探究，臥室床頭，床頭旁的椅子上，因為視距稍遠物體不甚明晰，椅子座面彷彿備置形若煙具之類，視覺臆測的疑團恐難現出真跡，吾人誠願愛斗如己的梵谷，在三更半夜恍然夢醒，他會起身摸黑，點燃孤苦的煙火領受暗夜淒然甜美的嬌寵。

梵谷將自己抽煙斗的情狀，繪入畫中公諸同好，除此之外他也專注側觀別人如何抽著煙斗，雇農、漁夫、沒有名姓的辛勤勞動者……共有六款俱皆為梵谷生活中（一八八三、一八八四、一八八八、一八八九各一幅，一八八五兩幅，其中一幅農夫口中的煙斗乃少見的「無釉赤陶」斗）熟稔的愛煙斗友。畫於一八九零年五月的蝕刻版畫「加夏醫生抽著煙斗」，正是這位對他深情體貼明知無效還懷抱深切的希望盡心搶救，在他對準心窩開槍癱倒，使他多彌留喘息於世，欲振乏力兩晝兩夜，這個致他於瘋狂的世界至今依然瘋狂絲毫未曾稍減。醫生加夏既已乏術可喚垂危的梵谷甦醒，梵谷仰憩在瀕臨死亡的枕籍，身兼畫家的加夏，用他醫生的妙手為



義大利詩人但丁



鄉土文學旗手唐文標

梵谷畫了兩幅肖像，一張木炭一張銅版，梵谷遺容得以在醫生摯愛的筆底長存永春。

梵谷留在畫裡的十六款煙斗，使後世的斗迷，只要能握有其中神似的一款，抽時也定能親切感受梵谷附身，梵谷音容宛在。

三. 二零一零·二·十八·黑海之波

只要願意別嫌麻煩，不管用什麼方法，烘焙自己動手，一沾新鮮，我擔保，你從此將溺斃於天機難宣的黑海之波，無岸回頭，連詩人但丁也邈遠安坐，靜靜地在他廣袤的《神曲》裡為你發愁。恩格斯曾經讚美但丁，「他是中世紀的最後一位詩人，同時又是新時代的最初一位詩人」。然，但丁絕不比你幸運，因為他無緣與聞咖啡的芳魂，那個他鍾情的女子貝雅特麗絲，當可與咖啡相提並論。

梵谷把藍色搪瓷的，紅銅製的，以及其他材質的咖啡壺畫入一些靜物畫裡。一八八八年九月他在阿爾勒也畫了與咖啡有關的兩幅「夜間咖啡店」與另兩幅「夜晚的露天咖啡座」，咖啡理應是梵谷的另一件生活愛物。

觀察咖啡容器的形體，或感染四幅與咖啡有關的氛圍場域，從而料想畫裡的咖啡，恐怕不是什麼好喝的汁液，該不致過於武斷的吧。梵谷也許不想太講究喝好咖啡亦未可知，但一八八四年十一月出現在紐倫的那幅「靜物」裡，「咖啡豆研磨機」人們都一目了然，它必定是排列在咖啡沖煮前一刻的操作程序，沖煮前才進行研磨咖啡豆，是可能喝到好咖啡的必要步驟，要命的關鍵在梵谷用了什麼樣的咖啡豆？他從未聞過剛剛烘好的豆子沖煮時，空氣中飄逸著希臘舞者Aura喜氣洋洋曼妙的姿幻？可見梵谷並不自己烘焙生豆，他的畫裡未曾出現烘豆機。

可惜他非晚生，與我同代，否則，我絕不吝於委託國際快遞宅配我親手烘好的咖啡豆，請他細細研磨靜靜吸嚥。更願另行組裝一部我的私房烘焙機，航空寄贈給他。我的私房烘焙機，零件樸素設計精簡，每次可供焙生豆150克，烘焙完成的熟豆125克，足夠他喝三天，豆子用罄日亦即烘焙時，如此三天的週期循環，他喝到的若是世上新鮮无比的咖啡，他為他所處的時代身心交瘁，適有一握香醇的咖啡及時為他提神。至於生豆何處尋覓？梵谷出生的低地之邦，曾經是東南亞印尼的殖民宗主，印尼生產許多好豆，或者從荷蘭佔有迄今的屬地加勒比海上的安地列斯貿易轉口，加勒比海上的諸國與拉丁美洲上，南迴歸線以北的幾些國度都有源源不絕的好豆。梵谷非晚生與我同代，殊憾！

犇

三月號

發行所：夏潮聯合會
社 長：陳福裕
總編輯：許育嘉
主 編：李文吉
編 輯：明 景
e-mail: chaiwanbenpost@gmail.com
blog: chaiwanbenpost.blogspot.com

索取點

【中正區】

估機街小劇場
南海藝廊
河岸留言
茉莉二手書店公館店
茉莉二手書店台大店
誠品書店台大店
山外書店
華山藝文特區
生態綠咖啡
國家電影資料館
NGO會館
華山藝文特區
文建會圖書館
台北國際藝術村
東吳大學城區部

【大安區】

腳踏車廚娘的店
黑潮咖啡館
開津堂師大店
秋水堂書店
唐山書店
女巫店
女書店
書林出版社
誠品書店敦南店
政大書城師大店
牙買加倉庫
Moi Relax Cafe
大紅人間藝文餐坊
BASTILLE CAFE
北義咖啡館
中國父餐廳
小地方
巫雲

【中山區】

台北故事館
伊通公園
非常南藝文空間
蘑菇booday

紅樓劇場

誠品書店西門店

【文山區】

世新大學正門
世新大學傳播大樓
政治大學政大書城

【北投區】

乒乓工作室

【松山區】

城市書局

台北皇廷小劇場

【台北縣】

有河BOOK

小小書房

【台中縣市】

東海書苑
東海和平咖啡館
敦悅書局東海店
秋水堂

【高雄市】

誠品書店大立店

誠品書店大統店

【花蓮縣】

ONE WAY 73



Chaiwan Ben Post

中華郵政台北雜字第1567號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2010
NO.
12

國內
郵資已付
台北郵局許可證
台北字第5515號
雜誌

本期發行量：7000份

犇犇的內容



左眼看世界 4

從德國製造到中國製造
國際分工體系的吊詭



用力深呼吸 5

谷歌、海地與中美關係
馬克思街上的妓女



日久他鄉是故鄉 8、9

四方報：是家人不是家電
對成露茜的記憶與感動



文化潮間帶 12

蝸居：引起廣大共鳴



黃土地 13

蟻族：做人難作城裡人更難



毒蘋果札記 16

唐文標、梵谷、菸斗與咖啡

老兵新傳

廣廷渤 油畫 2007

滿族畫家廣廷渤具有紮實深厚的繪畫功底、豐富的文化內涵與敏銳的藝術感受力，為中國當代寫實主義繪畫的代表畫家，與四川畫家羅中立並有「南羅北廣」之聲譽。作品《老兵新傳》曾榮獲中國大陸2007年建军八十週年全國美展銀牌獎。

敢闖敢拼福建人

文／林怡君

與幾個沿海省份相比，神州大地上，福建的曝光度顯然要少得多。外省人士——尤其在北方，對福建的文化風俗，也知之甚少。「千不怕，萬不怕，就怕聽福建人說話」，雖然這句順口溜原是要描述聽懂福建方言的困難，但同時也能察覺出，外省人士對福建的陌生感。

在北京，要是計程車司機和你閒聊，問起你是哪來的，只要說是福建，多數情況下，就算再能侃的北京的哥也沒話可搭，因為對福建的了解實在太少了。只能問問你，「從北京坐火車到那兒，要多久啊？」之類的，屬於基礎知識類的問答。

十里不同音

福建對許多外省人士而言，似乎總有一層神秘的面紗。「百里不同風，十里不同音」，是描寫福建的最佳寫照，福建實在很難一言以蔽之，東南西北中，福建大不同。閩北人安貧樂道，閩東人求穩怕亂，閩西人重宗內聚，而「過番」（下南洋）、「出洋」，到外面闖世界，則是閩南人的風尚。

在福建，經常是翻過一座山或是涉過一條河，語音就有變化。很長時間以來，筆者誤認為福建的方言就是兩種，北邊是福州話，南邊是閩南話。後來才知道，這是極大的錯誤。福建使用面積較廣的方言就有：福州話、閩南話、客家話、閩北話、莆田話、三明話等等。但即便同是閩南話，泉州、廈門、漳州的發音和語調上各有不同；同是客家話，永定、長汀、武平的發音也不同。這樣還不夠，同是福州語系，平潭、福清和福鼎、霞浦之間已難相通；而閩北語系中，浦城話、邵武話和建甌話也是大相逕庭。還有同一個縣說兩三種話，比如建陽市，東面以水吉鎮為中心說建甌話，西面以麻沙鎮為中心說邵武話。

邊陲來自中原

福建還是一個「移民大省」，移進來，又移出去。西晉末年，八姓入閩，這八姓是林、黃、陳、鄭、詹、邱、何、胡，這些中原土族為避永嘉之亂（公元311年）而南遷，一路輾轉來到福建（也有別的研究認為，諸姓入閩非始於永嘉之亂，而是在更早之前）。其後，歷史上還有數次大規模的移民活動。這些歷代由北方中原來的移民及後裔，構成了後來福建人的主體。



明末清初，大量福建人渡海來台，也把當地的宗教信仰帶到台灣。圖為福建湄洲媽祖廟，近年來，媽祖文化也是兩岸交流的熱點。



福建與台灣的往來非常密切。在廈門等閩南一帶，隨處可見與台灣有關的商店，如圖中位於廈門集美的「金門炮彈鋼刀」。

再由於福建山川縱橫，交通阻絕，人們往來不便，這些不同時期來的中原移民反而保留了各自的語言和風俗。而現在的中原大地，由於北方民族的不斷入侵與融合，文化早已產生了較大的變化。反而這邊陲的福建保留了古代漢人的語言和文化。比如，閩南人自稱河洛人。河洛，黃河洛水也。據學者的考據，河洛話保留了上古漢語語音，甚至閩南話（河洛話）還可與現今陝西、河南的一些方言相對應。

唐山過台灣

然而，或許血液裡流淌著祖先漂泊的基因，福建人的遷徙之路並沒有就此打住。宋元時，就已有福建人移居台灣的歷史記載。明崇禎初年（公元1628年），鄭芝龍建議福建巡撫把飢民數萬送到台灣從事墾殖，這乃史上第一次有組織性的向台灣進行大規模移民。至清代，康熙帝禁止大陸人民「無照渡台」。然而，由於福建的自然資源並不豐富，老百姓為了討生活，即便違背禁令還是得往外走，涉水出洋。那時有俗諺云：「第一好過番，第二好過台灣」、「過番剩一半，過台灣無得看」。也就是說，到南洋的，大概有一半的存活率；而到台灣的「六死、三留、一回頭」，只不到1/3的留下來。

但即便如此，大量的福建人散佈於東南亞乃至全世界，是著名的僑鄉。而台灣，也有超過70%的居民，其祖先來自福建。前些年，福建偷渡客在海上發生災難而遇害的聾人新聞時有所聞。有句順口溜說：「台灣怕平潭，日本怕福清，美國怕亭江，英國怕長樂，全世界都怕福建」。台灣社會在面對這些大陸偷渡客時，也經常呈現出一種備感威脅的心理狀態。其實，若把鏡頭拉得更遠一點，從歷史的長河上看，對偷渡並不需要大驚小怪。想想，台灣漢人的祖先，絕大多數都是清代禁海令時的偷渡客，來得早又活了下來的，繁衍了子孫，便成「開台祖」。

以現在一般的觀念來看，偷渡是一種類似

「難民」的不法行為。但據一些社會調查發現，福建幾個著名的偷渡村，如長樂、福清等等，那裡的百姓並不以偷渡為恥，在「致富靠偷渡」的思想下，能夠冒著身命危險，歷經萬難，在外打拼個幾年後，賺了錢，再回家鄉蓋起兩三層的小洋樓，是件可被讚好的事。這難道不是「唐山過台灣」的先民們精神之再現！

什麼私都敢走

有人把現今福建經濟之發展，歸結為三點，即黑色經濟、黃色經濟和藍色經濟。黑色經濟，指的是一些不法的經濟活動，比如走私、偷渡，和與黑社會幫派有關的等等。人們常說的：「什麼話北京人都敢說，什麼衣服上海人都敢穿，什麼東西廣東人都敢吃」，這裡恐怕還得補上一句「什麼私福建人都敢走」。2000年爆發的「廈門特大走私案」，被認為是中共建政以來「走私第一案」，從電腦晶片、化工原料、建材、摩托車、汽車，甚至石油、軍火，犯罪的連華集團什麼私都敢走。



虎年春節前夕，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左二）特地到福建省漳州市視察，探望在此創業的台商（左一）。圖為漳浦台灣農民創業園區，台商所設立的蝴蝶蘭花卉基地。

黃色經濟，當然說的是一些不正當的娛樂行業，據說台商在此貢獻不少。而藍色經濟，是指福建人大多有海外關係，海外資金乃發展福建經濟的一個重要因素。據一項新聞報導說，海外移民每年寄回福建家鄉的款項，達5億美元之多，是福建重要的外匯來源。

福建的經濟雖堪稱發達，但卻是個「不出經驗」的地方。比如，有所謂「浙江模式」、「蘇南模式」、「溫州模式」，這幾個經濟發達的地域以自己獨特的道路，成為大陸各地爭相學習的典範。然而，卻從沒聽說過有什麼「福建模式」或是「福建經驗」。這或許是像黑色經濟、黃色經濟這種不正常的經濟發展，搬不上檯面不足掛齒之故。這或許也是許多外省人士覺得福建商人「神秘」的原因。

個子不高絕頂精明

或許是千年來代代累積的冒險犯難的移民精神，福建人的進取心很強，比較重視實際利益，也就是成就動機很強的一群人。他們的天性樂觀，不拘泥於小事，非常勤勉，不願受他人的支配，有熱血性格。他們具有非常的耐心和堅忍不拔的意志，敢闖、敢拼，腦袋和手段都很靈活。若從商，善於不斷積累資金，從事堅實的事業，有人評價為是「可怕的商業對手」。有個消遣福建人的笑話就說，福建人會在下雨時帶兩把傘，自己用一把，然後賣一把。

說起福建商人，給人的印象大多是：他們的出場，都是以推銷為目的，什麼產品都有。身材小但能吃苦，個子不高但絕頂精明，一身西服，手裡總拿著一個真皮手包，不吸煙，但皮包內總裝有高檔香煙。臉上永遠都在微笑，他們整天出入飯店、賓館，夜晚各大娛樂場所都能聽到他們的歌聲。

如此行跡，讓外省人士就是摸不透福建商人是怎麼致富的。下一期將再帶您走進更深入的福建，福州、莆田、泉州、漳州、廈門，——分解。

第一次，我開了眼界



鼓浪嶼遠眺

文/李明書

一月底剛去一趟福建回來，這是我第一次到大陸，除了協助帶團、休閒散心之外，更重要的，是終於以實地的遊歷，印證了一直以來在台灣接收到關於大陸的訊息。

一個中國兩個印象

至少從國中開始，就有老師開始述說自己去大陸遊玩的經驗，有趣的是，每一位老師的經歷不盡相同，但是描述卻頗為相似，像是廁所沒門、用黑色的草紙當衛生紙、每個人都隨地吐痰、街道髒亂等等，似乎沒有什麼能讓人津津樂道的。在耳濡目染之下，對於大陸的想法，自是跳脫不了負面的評價。

抱持這樣的觀感直到高三，新聞逐漸播報關於對岸的消息；那一年，不斷重複的是大陸正蓬勃地發展著；尤其正逢要考大學的一年，校方、補習班為了督促自己的學生，以期有良好的升學率，不斷地告訴我們大陸的學生何等用功，圖書館永遠爆滿，為了讀書、學習，幾乎是到了廢寢忘食的地步。當時接收到的資訊，與過往的反差如此的大，衝擊著既有的印象，然而，由於無法實地考察，所以除了懷疑與納悶之外，似乎也沒太多想法。

上了大學，一脫離升學考試的壓力，重心就放在一般所謂的大學生活上，社團、課業、打工，幾公里以外的事，都跟我不相類似的，對於大陸的印象，就這麼淡了四年。

耳目所及生氣蓬勃

至今攻讀碩士班，一邊在人間出版社工作，有了較多認識大陸的機會，從出版的書籍、媒體、同事之間的談話，逐漸又開始接觸相關的學術、文化、政治、經濟訊息等等，感覺似乎跟既有的印象相差頗大，像是繁華的都市生活、便捷的交通、人民的學習態度，都不再是那樣的鄙陋、低俗；甚至於在台灣的生活，充斥著關於大陸的產品、資料，尤其與出版社的工作較為相關的，莫過

情的態度，招呼著外地來的我們，未來的發展，打開人與人、人與世界的關係，就從好客的性格開始。

就拿印象深刻的龍岩來說吧！對龍岩最難忘的景象，就是街道上不間斷的喇叭聲；我們走在有一兩公里長的街道，但是卻連一座紅綠燈都沒有，只有不停往來的機車與少輛汽車，每輛車的時速大概都不低於六十公里，並且習慣性地鳴著喇叭，但是卻不因喇叭聲的叫囂而互相起衝突，反正他們最大的原則就是不出車禍，喇叭聲大概就是扮演著提醒的功能而已，提醒行人小心，也提醒自己別撞到行人，因為他們總是會自行繞過行人。我們一行人邊看、邊聽，也邊笑，一位陳老師饒富深意地說：「這就是源源不絕的生氣。」我想也是的，如果不是由於有更重要事情而忙於奔波，怎麼可能須要這麼迅速地移動？又怎麼可能不為了被鳴喇叭而下車嚷嚷呢？

源源不絕的生氣讓我開了眼

在龍岩的夜晚，我和三位老師在一間小餐館小聚到凌晨。龍岩是個客家村，除了堅毅不屈的性格之外，人民的另一個特色就是好客，這項特質從我們進去點餐時就感受到了；店家先是很抱歉地跟我們說，由於太晚了，食材所剩無幾，能做的菜不多了；但是我們看著擺出來的食材，至少還有二三十種，從中搭配點了五六道菜，我們人少，也僅能吃得下這麼一點了，哪裡有太少的感覺？一直到凌晨兩三點，只剩下我們這一小



龍岩夜景

2010年大陸高校招收港澳台本科生報名

- 報名日期：2010年3月15日~4月16日
- 報名地點：
 1. 京港學術交流中心——香港銅鑼灣摩頓台5號百富中心16樓。電話：+ 852 28936355
 2. 夏潮聯合會——台北市敦化南路二段170號6樓。電話：(02) 2735-9558
- 考試日期：2010年5月22日(六)、23日(日)，共兩天。考試地點：九龍

- 第一階段《網上預報名》：3月15日~3月31日
1. 考生登錄「聯招辦網站」（<http://www.ecogd.edu.cn>）進行預報名。
 2. 考生需按要求輸入報考基本信息（姓名、性別、生日、報考點、報考科類、報考學校）。
 3. 預報名後，請自行列印預報名單，考生必須記住自己的「預報名號」及「密碼」，並按規定時間到相關報名地點辦理正式報名確認手續。

- 第二階段《確認報名及拍照》：4月01日~4月16日
1. 下列文件之影本一份，並請帶同正本以備核對
 - (1) 本人學歷證明或畢業證書（應屆生繳交在學證明）
 - (2) 高中各學年成績單
 - (3) 有效期限內之台胞證
 2. 兩吋彩色照片兩張
 3. 報名考試費港幣匯票600元。
- 匯票抬頭：京港學術交流中心
BEIJING—HONG KONG ACADEMIC EXCHANGE CENTRE

- 詳細訊息請參考「夏潮聯合會・大陸就學資料庫」，網址：www.xiachao.org.tw

從德國製造到中國製造

——國際分工體系格局下的吊詭

文／魏三多

根據美國「華爾街日報」的報導，中國大陸在2009年的全年外銷總額已超過德國，成為全球第一大出口國與名符其實的世界工廠。隨著中國大陸外銷市場的不斷擴大，「中國製造」與「德國製造」兩者的關係愈來愈被世人所關注，並且被放在天秤的兩端加以衡量。在一位美國財經記者所寫的書：《沒有中國製造的一年》裡，「中國製造」被烙上了低價、劣質、剝削中國勞工、剝奪歐美勞工生存權，甚至是黑心產品的印記；相反的，在另一本由台灣出版的《德意志製造》這部書裡，「德國製造」則是環保、創新、優良工藝傳統、現代主義的原型、便利生活的創造者，因而是高尚品位的代表。

中國製造與德國製造被放在「肯德/道德」、「低俗/時尚」、「抄襲/創新」這樣一種落後與現代的二元框架中來對待，似乎已是一種主流的論述習慣。更有甚者，高舉著「消費主權」的大旗，正義凜然地發起抵制中國製造的運動。在上述對中國製造與德國製造如此清晰而明確的劃分圖像中，事實上忽略了兩者背後所隱含的跨國資本的流動，以及國際分工體系的結構，從而表現出一種過於簡單與機械的思考。

我們只要稍微舉幾個產品的案例，就能知道此一關係的複雜性：德國采埃孚(ZF)2006年在杭州投產的汽車變速器，我們要把它稱為中國製造還是德國製造？中國家電巨頭TCL收購破產的德國史奈德(SCHNEIDER)電子公司後所生產的電視，應該被視為德國製造還是中國製造？又如以機械製造大國著稱的德國，其電動工具卻有90%從中國進口，其中大部分以中國代工，德國貼牌的方式出現在市場；BMW、賓士等德國名車，其內臟幾乎都塞滿了中國代工德國品牌的零配件，這些「中」骨「德」皮的產品，往往又以高出代工成本數十倍的價格，打著優良品牌的旗號銷往世界各地，它們到底是中國製造還是德國製造？

德國製造的身世

事實上，「德國製造」這個以近代民族國家(Nation State)的標記做為產品的身分，源自於十九世紀末期——當時，英國作為老牌資本主義與工業革命的國家，為了在其國



內市場上保護本國產品，用以區隔新興的德國工業所生產的劣質廉價品，而強加在德國製造如此清晰而明確的劃分圖像中，事實上忽略了兩者背後所隱含的跨國資本的流動，以及國際分工體系的結構，從而表現出一種過於簡單與機械的思考。

我們或許可以這樣來理解，德國製造在一百年前的身分就像今日的中國製造。它經歷了引進發達國家的技術設備，從模仿與仿製為主過渡到自主創新生產的階段，同時在國際聲譽上從遭遇歧視的待遇，以及來自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的妖魔化，到被當代推崇為「高品質」的代名詞。所以德國製造並不是一開始就是現今的面貌，而是一個由小到大，由弱到強的發展過程。

事實上，面對21世紀國際分工體系的結構調整與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趨勢，歐盟計畫取消諸如「德國製造」、「英國製造」改為統一的「歐盟製造」，雖然遭到德國的反對，但是卻也反映了自19世紀以來國際分工，經歷了從部門間分工到產業間分工、再到產品間分工的過程，形成同一產品不同工序間的國際分工，導致像「某某國製造」這樣一種帶有特定生產國印記的標誌名實不符。在這種新的形勢下，「德國製造」或許在不久的將來也會成為歷史名詞。

世界工廠的工廠

幾乎在英國人放棄製造業的今天，「德國製造」仍雄踞歐洲製造業之首，並且成為德國經濟重要的支撐力量。當傳統的德國製造面臨來自新興國家的低價挑戰時，德國憑藉著優勢的科技水準成為世界工廠的製造者。如果說中國製造是世界工廠，那麼德國製造就是世界工廠專用設備的製造者，它是世界工廠的工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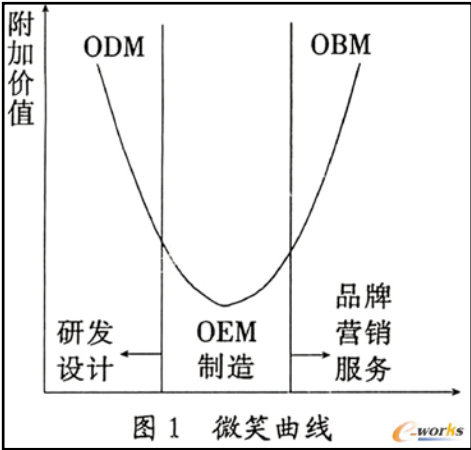
表面上看來，似乎是德國傲人的創新技術，讓他們在歷次的經濟危機中化險為夷，所以德國人也自豪的認為「德國製造」就是「製造科技」。事實上，自20世紀八十年代末開始，科學技術特別是資訊技術的發展，以及各國放鬆對資本流動的管制，推動著資本全球化的步伐。然而，由於全球利潤分配的嚴重不平衡，資本的全球化所造成的新國際分工，雖然模糊了產品的國別性格，但是卻是以重新劃分國家間等級關係的格局為代價。因此，所謂的「中國製造」與「德國製造」不僅僅只是科學技術這樣一種表面上的差別，兩者的關係其實是全球利潤分配失衡下貧富、南北等級的差別。

隨著資訊技術、服務業以及全球化進程迅速發展，國際上不同產業間的垂直分工格



局被打破，代之以同一產業內部產品生產的不同環節來進行。具體而言可以分為三大環節，即上游的研究與開發，中游的生產，以及下游的流通。對於發達國家來說，他們正是藉由控制同一產業內部的上、下游環節，而將中游加工製造環節轉移出去交給發展中國家來進行，從而使其生產結構呈現出典型的「啞鈴型」，並在此基礎上控制著產品的利潤分配。也就是說，一件產品的生產最終所兌現的價值，大部分被發達國家控制在手中，而發展中國家的製造業則只能分配到最低的利潤。

德國製造的發展模式，雖然迥異於英美等國放棄製造業改走高科技與金融服務業的路子，但是德國製造作為世界工廠的工廠，其真正的意義在於它仍然牢牢掌握著產品價值鏈的上下游，德國製造所生產的工作母機決定著中國製造的生產前利潤，它更透過品牌流通掌握生產後的價值兌現。如果說中國製造因為只能分潤極低的產品價值而不時有血汗工廠的出現，那麼我們就更應該要知道，壓在血汗工廠身上的巨型啞鈴，則是那些看似優雅、外表光鮮並控制在發達國家手中的研發設計與產銷流通兩座大山，而所謂高尚品位的背後，原來是以別人的血汗為代價。



是中國製造？還是世界製造？

從現實層面來說，中國製造與德國製造確實存在著國際分工格局下不對等的落差，這也是中國製造必須突破的瓶頸。中國大陸的商務部日前聯合了四家商會在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刊登了一則商業廣告，目的是為了向世界宣傳「中國製造」並非廉價品的代名詞，同時也在強調：「中國製造」其實也是「世界製造」。的確，當我們說中國大陸是世界工廠時，真正的意義在於它是全球資本流動與國際分工格局下的產物。我們必須站在這一高度上來重新理解中國製造所包含的意義與存在的問題，從而打破一種靜態的「落後/現代」二元對立的想像，而能較為公允而不是歧視的解讀中國製造，同時更為理性而不是濫情的吹捧德國製造。

文／歐冶

2010年開局即不平靜。在短短的半個月時間裡，「谷歌(Google)揚言退出中國」和「海地大地震」吸引了無數的眼球和議論。不同之處在於，前者引起了摩擦——中美兩國從政府到民意甚至網絡輿論的摩擦，後者體現了同情—人道之心讓世界對這個小國伸出援助之手。

這兩個事件都挑戰了傳統的外交定義。谷歌，一個商業公司，公然與一個主權國家叫板，並引起世界上兩個大國之間的外交糾紛。去年哥本哈根會議期間，一位專家朋友開玩笑說：世界各國領導人坐在一起談論空氣，怎麼都覺得那麼「荒謬」。如今更加超現實，大國政治乾脆在虛擬空間開局了。

海地，一個與中國沒有建立外交關係的國家，卻由於受災而佔據了中國新聞媒體的黃金時段，中國政府高調派出援助人員和物資。古巴也不願與美國幾十年敵對的狀態，允許美國飛機飛越其領空運送救援物資。美國接管機場後，雖然也引發了小小的外交糾紛，但各國還是「救人要緊」，顧全大局。

這些「非傳統」的外交事件，值得揣摩。

旅德札記，之一

住在馬克思街上的妓女

文／方無隅

在暗地裡，一切都還活著。
—— Volker Braun, 2000.

我的一位朋友跟她的男友合租了層公寓在馬克思街旁，這裡也算得上是德國Trier這座小鎮的「內城」，但是精確的說已經在老城區的邊上。離他們家不遠處是馬克思的出生故居，或許正是這樣的緣故他們家前面的街道才被以馬克思命名。然而奇怪的是，馬克思故居卻並不在馬克思街上而是另起了別的名字。

有一天，我的這位朋友滿臉啞容的跟我抱怨，昨晚他們家樓下喧鬧了一夜，據她說是住在樓下的幾個保加利亞妓女辦了一個狂歡的Party。由於馬克思街就是這一帶移入勞工與性工作者的地盤，再加上整棟樓的鄰居懼於這個妓女中繼站兇狠的保鏢，包含她自己都不敢去招惹他們，只好自認倒楣。

跟我的朋友喝完咖啡分別後，我在回家的路上不由得被一絲莫名的念頭襲擾著。我想起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用溫暖而極富同情的口吻，描述那個被迫作為一夫一妻制虛假性背後補充物的妓女容貌，想起德國這麼個高度發達與成熟的西方市民社會，仍然必須依靠土耳其的勞動力與東歐的女性鋪墊起他們的高雅與從容。

當然，讓我感到極大不快的真正原因並不是來自那種習以為常的偽善，而是來自我自己與恩格斯筆下那個妓女的同命——如果我能算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話。回顧20世紀，左派們在放逐諸神之後也被自己所放逐，蘇維埃在反革命的浴血戰鬥中，卻同時把對手的特徵烙印在革命的心臟上。由於革命的反革命化，歷史的共業讓我們像在道德上犯了罪的妓女一樣，徘徊在厄夜的街頭巷尾。

事實上，我也不是真的那麼的不快，對於與妓女同命的我來說，一夫一妻制的越是鞏固，對道德貞操要求的越是純粹，女性身體的商品化也就越無可取代；同樣的，資本主義全球化的腳步越是肆無忌憚，貧窮與飢餓的恐懼越是鋪天蓋地，跟我同命的人只會愈來愈多。問題不在於歷史是否終結，因為它不曾也不會終結，問題卻在於舊的思維方式已難以解決問題，我們必須像魯迅說的「世間本來沒有路」那樣，自己開出一條路。



中國派駐海地的維和部隊的8位罹難者遺體返抵國門 新華網

事件中的「矯情」與「真情」

谷歌和海地，在中國觀眾眼中，前者實屬「矯情」，後者更多「真情」。

對於谷歌事件，我們不作猜想和詮釋。不過，商業公司自願進入一個市場，又彷彿受了天大委屈高調揚言退出，這事本身就犯矯情。對於此事，網絡意見紛雜，然而對谷歌

或美國稍有微詞者，卻經常被一些標榜言論自由的人士冠之以「五毛黨」，也是一種矯情。商業公司沒走，美國國務卿卻發表政治講話，本來明明是「當頭炮、馬來跳」式的標準開局，非要整得這麼玄，也是矯情。

對於海地地震，中國人則是動了真情。不僅因為汶川傷痛未平，也不僅因為維和官兵的犧牲，更是因為中國人一向認同人道主義的世界價值，在自己的國家日益強大後，真心願意承擔一個新興大國的國際責任。海地不是中國的邦交國，但中國長年派駐維和人員，並在震後迅速伸出援助之手。中國中央電視台也在黃金時段大段播出美國等國的救援舉措，正面播放奧巴馬總統的演說，其中不見西方一些媒體所慣用的歪曲、譏諷和斷章取義。對於美國軍事實力進入海地，中國主流媒體「不憚以最好的善意」，並未進行過度詮釋（這對於一些西方媒體是不可思議的）。究其原因，中國人認同包含美國在內

都沒有得到世界，包括其歐洲盟友的廣泛認同。

其次，美國應該自問一句「美國怎麼了」。面對一個迅速崛起的同時不斷「再保證」自身發展和平性質的中國，一個努力維護世界和平而非挑戰的中國，美國的神經似乎總是過於緊張，美國怎麼了？是美國失去了世界頭號霸權國的自信？還是美國確實「需要」塑造這樣一個敵人？如果是前者，美國大可不必，因為它世界頭號強國的地位依舊，中國的國際戰略中沒有霸權競爭這一條。如果是後者，美國要警醒了，因為自證預言或許比敵國外患更危險。美國政治學者米爾斯海默曾預言中美必有一戰，「中國通」哈里·哈丁則說，將中國當做假想敵的結果就是中國真的成了敵人。



谷歌北京總部

的國際社會所進行的人道主義救援的正義。筆者不知道、也無意指導美國怎樣做一個更好的頭號強國。只是，在這矯情與真情之間，呼應的是公道自在人心的中國古訓。

美國是誰？美國怎麼了？

21世紀前10年，美國兩位著名的政治學家和經濟學家分別寫了一本反思美國的書：《我們是誰？》(Samuel P. Huntington: Who Are We?)和《美國怎麼了？》(Paul Krugman: The Conscience of a Liberal)。前者剖析了美國國內面臨的認同危機，後者指出保守主義運動使20世紀末以來的美國走向一條反民主、反民權、反福利的道路。然而，不管美國國內狀況如何，美國在對外政策上有一個不變的落腳點，即維護美國的國家利益。無論小施萊辛格所說的「鐘擺」擺向哪一邊，都是如此。只是，保守主義者有時表現得更「現實」，自由主義者在追求現實目標的同時，更在乎那一套說辭，用他們的話說，叫「價值觀」。

別小看這套「價值觀」。同樣的事情，別人是侵略，美國是預防性戰爭；別人是侵犯人權，美國是反恐；或如希拉蕊1月22日講話所影射的，別人是限制網絡言論自由，美國只不過是合理的「limits」。

對美國國內政治提出的這兩個問題，同樣適用於美國的對外政策。首先，美國應該反思一下其在國際社會中的「認同」，問一問「我們是誰」。在國內經濟民主長期遭到侵蝕、族群鴻溝拉大、社會良知和新聞批評受到越來越大壓力、人權醜聞頻頻曝光、不斷違反國際法、挑戰現有國際機制的同時，在國際上動輒以民主、人權、憲政和言論自由為由製造事端，是否會得到廣泛認同？是否真正有利於美國的利益？21世紀以來，美國在反恐戰爭、氣候變化、監獄暴行等問題上，都沒有得到世界，包括其歐洲盟友的廣泛認同。

認真思考了這兩個問題，美國應該冷靜下來，在國際社會中多塑造真情，少製造矯情，為希拉裡所說的「下個世紀的進步」增加一份建構性力量。

原文發表於《中國社會科學報刊網》
(<http://sspress.cass.cn/news/7401.htm>, 2010.1.26)



中央民族大學是中國大陸唯一具有56個民族師生員工的高等學校，也是民族類院校中，唯一一所國家「211工程」及「985工程」建設的全國重點大學。作為少數民族教育的最高學府，民大有著濃郁的民族氣息，是中國大陸56個民族的一個縮影。民大校訓中的「美美與共」一詞，便是親自參與創建民大的費孝通教授所提，意為不同民族間要相互尊重、欣賞和讚美對方文化。在這樣的創校理念中，各民族的語言、文化、風俗習慣相互交織於民大，也形成了學校特有的民族文化氛圍。

北京最「美」的一條街

民大位於古蹟林立、學府匯集的北京西郊，南有國家圖書館、北接中關村高科技園區；環境典雅幽美，人文氛圍濃郁，科技資訊集中，既有古樸典雅的風貌，又有現代氣息撲面而來。尤其民大與鄰近的北京舞蹈學院美女雲集，校園坐落處號稱北京最「美」的一條街。

民大的歷史可追溯至1941年創建的「延安民族學院」；1951年在北北京正式成立為「中央民族學院」；1993年更名為「中央民族大學」。在中央民族學院的籌建工作中，學校制定的未來發展方向和辦學宗旨便是明確學校「研究民族問題、培養少數民族人才和各類專門人才」的辦學定位。於此，由費孝通教授為首的「中央民族學院研究部」廣泛招募學科人才，不但中央政府從清華大學、北京大學選調了一批知名教授到校任教，許多蜚聲海內外的專家學者也先後加入，促成了研究部成為當時民族學相關領域的薈萃之地，中央民族學院也迅速地成為了具有國際影響力的著名學府。



民族類學科為主多元發展的綜合大學

經過50多年的建設和開拓，民大憑著厚實的學術底子，逐步發展成為以人文社會學科為主體，以民族類學科為特色，文、史、哲、經、管、法、理、工、醫、教等學科門類齊全，本科、研究生、繼續



民族大學校門

教育等多種辦學層次兼有的綜合性研究型大學。學校的民族學、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學、中國民族史、中國少數民族經濟、中國少數民族理論與政策、民族宗教學和中國少數民族藝術等學科具有雄厚的實力和特色優勢，不僅在中國大陸居於領先地位，而且具有一定的國際影響。經濟、法律、新聞、管理、生命與環境科學、電腦科學與技術等



民族大學舞蹈課堂

學科也得到快速發展並具有廣闊的前景。堪稱是中國民族院校中專業設置最多，人才培養層次最高的大學。

秉持著以人為本、培養少數民族人才的發展理念，民大特別提供了特色專業給少數民族青年。例如由國家特別扶助的「少數民族文學」專業，就讀這個專業不但不收學費，而且學校還提供有專業獎學金及助學金，解決了經濟困難學生的後顧之憂。不少民大學生在民族類專業學科特點的教育裡，一方面學習到相互包容，另方面認識到自己的社會責任感，讓青年學子更加堅定了關注和服務少數民族及民族地區的研究志向。

順應學校大力實施人才強校規劃，教師隊伍建設成效顯著。民大的老師投注在教學上的熱情，不但

壯大了科研成績，對學生的用心和對學術的嚴謹，在無形中亦贏得大家的認可。

名師雲集成就出類拔萃

畢業於民大，現在舞蹈學院擔任教授的慈仁桑姆，為了將最新的科研成果傳達給學生，不斷地改進教學方法。她從藏族舞蹈出發，並融合各民族的舞蹈藝術，她在全面地掌握藏族民間舞技藝的基礎上，還學習領悟了蒙、朝、維、傣、彝等民族舞蹈的藝術風格韻律，編排許多不同民族的民間舞蹈劇目及教學組合。

在維吾爾語言文學專業教授漢語閱讀課的關平秋老師，雖然不是維吾爾族，也不懂維語，但通過多年來的教學實踐，她將自己的心得攆起來教給學生，並且將其編進漢語閱讀教材。教材出版後，受到新疆、內蒙、青海、延邊等參加民族漢語水平考試的學生和教師普遍歡迎。

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學學院的戴慶廈教授一直專攻民族語研究，通過語言田野調查，在接觸實際的語言中，有了對語言分析的初步能力，而且對社會、民族有了進一步的了解，在雲南邊疆景頗山寨實習的期間，親身體驗到了群眾的甘苦，使戴老師堅定了為少數民族服務的決心，也讓往後的發展提供了持續性平台。截至目前，戴教授已經發表民族語研究論文280餘篇，出版民族語方面的專著30部，這些成果凝聚著他幾十年的心血和智慧，為民大創作出具有領先水平的學術成果。

探索民族教育的發展之路

進入新世紀，民大進一步明確了

「面向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辦學、服務於民族團結進步事業發展、培養少數民族優秀人才、建設高水準研究型大學」的辦學定位和發展目標；確立了「提升人才培養質量與學術創新能力」兩大發展主題。民大抓住機遇，進入又好又快的教育發展軌道。在人才培養規模成倍增長的同時，學校堅持以教學為中心，大力推進各項教學改革和建設，努力提高教學質量。目前學校占地40多萬平方米，各類建築30萬平方米，學校並大力加強基礎設施建設，開創出較好的教學、科研條件，並建成了高水準的數位化校園系統，將教室全部實現多媒體化。大陸教育部專家組讚譽民大「探索出了一條中國民族高等教育的創新發展之路」。

除了教學系統外，民大最為人稱道的便是頗具民族特色的圖書館與民族博物館。2003年建成的圖書館，面積達2.45萬平方米，現在館內擁有圖書198萬餘冊，少數民族文字圖書和民族學科文獻居大陸高校首位，在國內外皆深具影響力。古籍中眾多的漢文年譜、家譜、傳記等珍善本古籍和20餘種少數民族文字的寫本、刻本、金石拓片、清人畫冊等，不乏稿本、孤本，可謂價值連城；如明萬曆刻本《兩朝平壤錄》、清乾隆武英殿本《平定準噶爾方略》、清朝駐新疆大臣的《饒應祺奏稿》都是該館獨有重要史料。自1951年以來，圖書館始終堅持民族資料蒐集工作，對民族文獻進行連續加工整理，現已將50多年累積的民族資料合輯成3440餘冊。

而在民族博物館部分，館藏有近3萬件珍貴的民族文物可供教學、研究和觀摩。民族博物館是全國歷史較長、規模較大、藏品較多的民族學專業博物館之一，是大陸高校百餘家博物館中唯一收藏56個民族文物的博物館，還是中國大陸北方唯一展出台灣原住民文物的博物館。



民族大學學生演出藏族農奴翻身

56民族團結與進步的縮影

在兩岸文化交流上，除了持續關注，民大也做出了積極貢獻。為了促進兩岸學術的互動與合作，民大和台灣的文化大學函簽合作協定，選派學生至文化大學進行研習。另外，民大亦開辦有台灣少數民族才藝進修班，讓台灣學生更多地了解大陸的民族文化藝術，也讓兩岸少數民族師生間能夠相互切磋、教學相長。目前對港澳台的招生工作上，則開放有研究生項目招收台生，讓許多對民族學領域有興趣的台灣學子在這個各民族匯聚的校園裡有機會進一步地研究、學習。

此外，至今民大亦已與18個國家和地區的70多所大學及科研機構建立了交流合作關係，大批選派師生赴國外知名大學進修、學習、訪學和培訓。通過實施「111引智工程」和「海外名師聘請計畫」，學校聘請了許多國際知名學者到校工作。同時，在校各類留學生數量逐年遞增，學校的國際化程度不斷提高。

辦學歷程中，民大始終致力於培養少數民族人才，服務於民族團結與發展，56個民族團結進步的縮影和民族高等教育事業創新發展的實證，民大以團結奮鬥精神為自己書寫了引以自豪的歷史，並贏得了國內外的普遍關注和讚譽。



民族大學教學樓

笑看未來，下一個十年會更好

一專訪為愛滋病患者維權的宋鵬飛

文／陸序

在網路上瀏覽十年來關於宋鵬飛的文字報導，可以明顯感受到他面對自身的經歷和外在世界的心境不斷地在轉化。遭遇生命中的劇變，他一步步由自己口中「過早成熟」的少年，走向一個能沉穩流利的，在媒體前為愛滋病患者維權的精神形象。我們不需要在他的氣質中，尋找幾年前的報導裡，那個說「這個年紀，不愜(青)才不正常……愜青這種狀態是自己故意保持的，不愜了會覺得心態特別蒼老」的小夥子，然而，在2001年為宋鵬飛下了小標題「不談未來，只談現在」的記者，是否想得到，當年的「愛滋少年」早已著手幫助了更多需要關懷的人，而他主持的藝術治療項目，名稱正是「笑看未來」。

2009年12月2日，第22個世界愛滋病日的隔天，我初次走進宋鵬飛位於北京豐台區的佑安醫院辦公室，像學校教室會有的課桌椅聚集在一塊兒，這個為愛滋病患者開設的藝術治療空間，以前是愛滋病房，約莫可以放置四、五張床位。

當時的媒體叫我「愛滋少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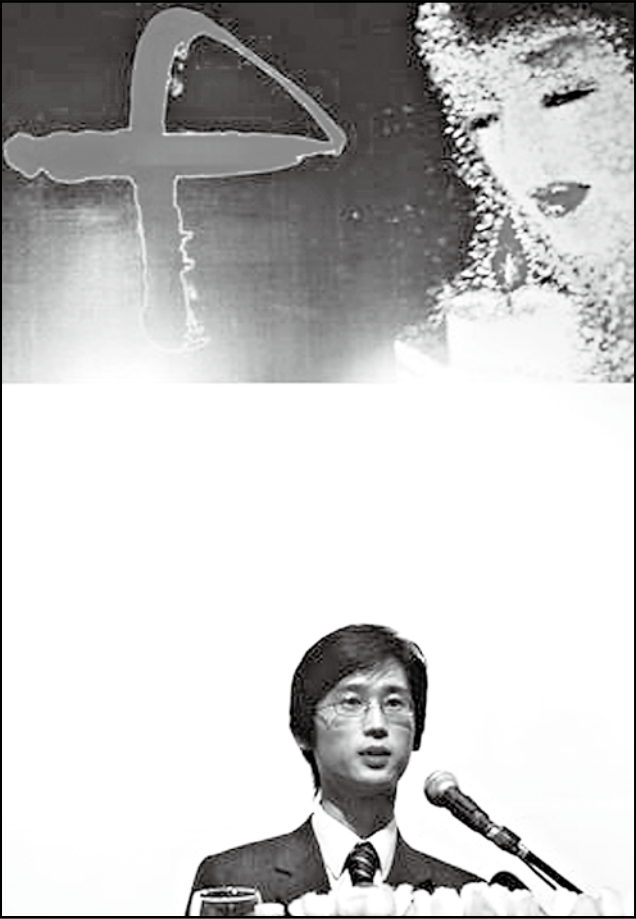
作為中國第一位公開身份的愛滋病患者，宋鵬飛在十年前因為輸血感染了愛滋病。當時只有十六、七歲的他，引起了國內和國際媒體的注意和關心。宋鵬飛說，當時主要是希望自己的醫療事故，能夠在法律上得到解決，所以選擇曝光身份。但是於此同時，因為在他山西老家的人們，對愛滋病害怕又不了解，正值初中升高中的時候，學校就令他退學，之後的宋鵬飛沒有再上過學。

他說，「最早上電視時，是以我父母為主。18歲開始，因為已經歷了兩年，我決定個人的事情由我個人承擔，不再讓我父母碰任何媒體。19歲時我自己租了房子，不希望再影響父母的生活，當時想，反正也活不了多少年，那也沒必要連累父母，是死是活，我可以自生自滅。當然現在我不這麼想了，但是，我也明白國家對我個人的補償會是怎麼樣的，是按照當時的國情。不像在發達國家，出了這種事故，可以賠你上千萬美元……這在中國是不現實的。在中國的政治環境下，醫療制度是個很複雜的問題。我的父母是健康的，他們擁有自己生活的圈子。當時的媒體叫我『愛滋少年』，把我的家庭冠上『愛滋家庭』的稱號，這是很恐怖的。所以。我開始希望大眾可以把我當作宋鵬飛個人，從此來投入反歧視、增進愛滋病患者福利的工作中。」

宋鵬飛開始到馬來西亞等地參加各種關於愛滋病的國際會議，思考著自己能做點什麼事。在十年前，關於愛滋病的知識普及，都是官方行為，不像今日中國各省大多都有關懷愛滋病的NGO(非政府組織)。經由在大學和媒體上述說自己的故事，宋鵬飛令許多人感動，願意去重新了解愛滋病，甚至有很多人寫信給他。他認為，「相對來說，我比別人更幸運的是，我當時年紀小，又是輸血感染。很多老百姓的歧視是因為考慮到感染者的感染途徑。如果你是因為同性戀或吸毒感染，人們會認為這是個道德問題。我可以說是相對來說有這兩個優勢，人們可能會同情我。」於是，至今28歲的他，先是以個人，後發展為團隊，從事為愛滋病病患維權的活動已有十年了。

歧視仍然存在，改變得慢慢來

就愛滋病在中國所面臨的歧視，宋鵬飛認為，有時社會上的歧視，讓人覺得是不能埋怨的。因為，「這個社會的倫理、道德、價值觀和西方的開放的環境是完全不一樣的。我們不能要求它在面對一個新事物、新的傳染性疾病的時候，要像西方發達國家一般去接受。美國一開始發現愛滋病的時



候，他們約花了十年左右的時間，就把這樣的歧視的問題解決的差不多了。比方現在你去美國、澳大利亞、歐洲，你說你自己是HIV，沒人會覺得有什麼。但是中國就不一樣了，做了二十多年的宣傳，從最早的官方，到近十年的民間NGO，都已經做了很多，外面的歧視卻還是存在。另外，中國有非常多的人口，每個地方的發展和觀念的差異都不同。」

「好比西南地區有許多吸毒感染者，但這幾年少數民族的愛滋病宣傳做的非常好，在當地，這些項目幾乎都是少數民族的人在做，常比其他發達城市做得好，至少在宣傳上會更認真、積極，地方上的衛生系統會更快的理解這個疾病的需要。而大城市裡，往往存在著各種文化、倫理方面的差異，它們要宣傳關於愛滋病的知識教育時，要考慮到會不會影響我的小區、單位或企業等等…問題會很複雜。相比之下，偏遠地方的宣傳工作，不會遇到那麼大的壓力。地方政府知道在他們那裡有吸毒的人，有這種疾病，他們就會投入。而面對整個中國社會，我們不能期待在短時間內，把歧視的問題全部消除。在以前，我會覺得社會怎麼如此無知愚昧，對愛滋病的歧視如此嚴重。但是經過這麼多年，我們琢磨、考慮明白了。」

我們要擁有存活下去的機會和權力

從2002年開始投入對愛滋病患者的藝術治療項目到現在，宋鵬飛明顯地感受到整個社會對愛滋病的態度已然改變了很多。他因為工作的關係，經常去很多的省份參加會議，並對當地的NGO工作進行了解。他發現，這些年來老百姓的觀念由於官方、NGO和志願者的努力，對愛滋病的認識已和過往大不相同。

「這三四年，作為中國的高層政府，對愛滋病是做了很大的努力，你沒有看到哪一國的領導，像中國一樣，每年的愛滋病日都要去愛滋病人家裡做客。中國政府這些年做

的，讓我很感動。我想像不到，作為一個國家主席，每年都要到愛滋病村裡面去……國家領導人已經這樣做了，至少從高層來說，他不歧視，能夠明白這個疾病，就是很大的努力。」

現在，宋鵬飛正在努力將約莫100個的關懷愛滋病的NGO，組織為一個「中國感染者愛滋病網絡聯盟-艾微網」(www.hiv.com.cn)，希望能做一些更高級別的項目，結合大家的力量，讓國家在福利保障、法律方面的平等政策上更關心愛滋病患者。

「對我們來說，這個群體需要社會的關心，我們要擁有讓生命存活下去的機會和權力。首先困擾我們的，便是藥物和治療的機會。在中國，政府有提供免費的藥，但是這個供應的速度比不上病人換藥的速度。愛滋病藥物的麻煩在於，患者吃幾年後就不能再吃了，必需換藥。國家免費提供藥物的政策很難滿足這種需求，加上每個患者的個體需求又都不同，還有藥物的專利保護權等等問題。政府也想要幫助我們，但是政府也有它的難處。」

笑看未來，下一個十年會更好

在位於佑安醫院的工作室裡，曾經有先後約100位河南輸血感染的患者，在來北京接受政府的免費治療的同時，每週有三次在此作畫、聊天的機會。當時來北京治療的都是農民，正由於農村對愛滋病的歧視非常嚴重，他們的精神狀況非常糟糕，一開始幾乎不敢離開病房。但是在三個月的繪畫活動後，患者的心理很顯著的得到了改善，鼓勵了宋鵬飛繼續開設這樣的課程。後來，工作室以服務北京當地新發現感染的患者為主，至今已有五百位學員參加過繪畫、泥塑、短片拍攝等不同的活動項目。

在宋鵬飛和他的工作伙伴到酒店、國際俱樂部、大學、旅舍、鳥巢、餐廳等處宣傳愛滋病預防和相關知識的時候，甚至有些患者會主動向民眾散發傳單。讓他挺感到自豪的是，現在一些位於北京的NGO負責人，有好幾個就是曾參與工作室的活動，後來也投入到關懷愛滋病的行動中。

儘管這是中國第一個也是目前唯一的愛滋病藝術治療項目，宋鵬飛對此不願持著過大的期望，他說，「我希望能幫助就幫助一個人，我只要保證今天有十個人來這裡畫畫，在這幾個月內能讓他們心裡高興，那就成了。其餘就順其自然。對我來說，要微笑、積極的面對每一天，以最寬鬆的心態去面對發展。我仍很期望我們有一天能夠得到很好的治療，同時去上學或找工作時不會有歧視。我能感覺到會有那麼一天，我願意等，但這不是說三年、五年的，可能還需要再等十年，而我已經等十年了。」



是家人不是家電

——訪《四方報》總編輯張正，談東南亞移民移工

文／李文吉

二十幾年前，〈人間雜誌〉在解除戒嚴前後的台灣出現，為戰後40年的經濟發展做出深刻而且廣泛的現場報導與反省。我有幸在年輕時參與人間雜誌的報導工作，隨時受到陳先生、工作夥伴與受訪者的啟發、鼓勵與教誨。

捨下年幼的孩子，照顧被你們拋棄的父母

幾年前，在「夏潮文藝營」課堂上，陳映真先生說，他參加某大報為外籍勞工舉辦的文學獎的評審工作，讀了很多感人的詩。我永遠記得他所朗讀的詩文內容：我們捨下年幼的孩子，離開貧困的母國，來到富裕的台灣，為你們照顧老邁臥床的父母，這些幾乎被你們拋棄的父母……

我相信那天，陳先生文學家的敏銳與深情喚醒很多與會者的良心。從那時起，我對於這些膚色與五官和我們漢人不太一樣的東南亞移民移工有了新的感激與尊敬。

2006年的秋天，專為東南亞新移民與移工發行的《四方報》創刊問世，繼人間雜誌之後為弱勢者發聲。翻翻最新一期的《四方報》越南文版，發現有三分之二的版面的內容是讀者的投稿：訴說心情、親情、愛情的詩文和圖畫。這樣有意思的刊物怎麼可能在台灣出現？為此，《新報》新移民版特別專訪了《四方報》總編輯張正，談談這個特異的文化現象。

《四方報》：成露茜創辦人淑世理念的延長

張正今年38歲，政大公共行政系畢業後，1996年到立報當記者採訪政治新聞，後又跑社運新聞，立報縮編後任社論主編。「我本來也沒甚麼進步思想，但是立報的社論都是左派寫的，我天天看著看著，慢慢知道工運、社運是甚麼。」張正笑呵呵地說。

1991年，世新大學創辦人成舍我的女兒成露茜由美返台，接手《台灣立報》並創辦《破報》，還有「社會發展研究所」，關注社會與弱勢的發聲與權益。她在美國的博士學位就是研究華工婦女，特別注重現場調查。《四方報》是由她發起與支持的，也是她淑世理念的延長。



成社長與四方報志工及同仁合影



讀者可以在四方報上畫畫、寫詩、講心情、談婚姻、罵老闆

「（成露茜）社長很看重我，看我對早報、晚報沒興趣了，便找我和邱德真籌畫東南亞語文的刊物，我去暨南大學唸東南亞研究所也是她建議與支持的。我到越南田調三個月，會點越南話，所以她讓我編越文版。我研究的是移民、外勞與外配，想的是怎麼幫助他們在台灣過得好些。當時她已經罹患癌症，還這麼積極的提出這個想法，我覺得很有意義，就決定全力以赴啦！」

投書如雪片：從《立報》南洋版到《四方報》

開始時是每週在立報開闢一個「南洋版」，向台灣人介紹越南、泰國、印尼、菲律賓等國家，希望藉由了解促進尊重，但是發現讀者沒啥反應，所以決定從2006年9月開始正式以越南文字和泰國文字兩種版本發行《四方報》，讀者群鎖定來自這兩個國家的移民與移工。越文《四方報》一出刊即獲得讀者熱烈迴響，投書如雪片飛來。篇幅從一開始的16版，逐期8版8版的增加，到現在第四十期已經厚達八十版。

張正說：「開始時只有我一個編輯，外加一個越南籍志工。我白天把越文稿件收齊，下班就騎車到中和的樂華夜市把稿子交給她，請她看完隔天給我。她就是現在的越文版主編阮舒婷，是越南的大學畢業生，嫁來台灣後和先生在夜市擺攤賣章魚燒。」現在《四方報》發行量已達三萬份，全職編輯有三人，兼職編輯有二人，還有多位志工；收支差不多可平衡，尤其是廣告量可達四、五十萬元，在不景氣的現時台灣殊為不易。但是泰文版四方報就搞不起來，讀者沒回響，廣告也不進來，曾一度停刊。為什麼？就讓張正從頭介紹東南亞移民與移工。

孤立無助的外配和看護需要外界的訊息和支持

張正表示，1990年代左右，台灣經濟開始起飛，需要的勞動力日益增加，3K工作（辛苦骯髒危險）本地人不願意做，就開始引進泰國勞工；台灣人口高齡化，年輕人又不喜歡照顧父母，就住越南、印尼、菲律賓引進外籍看護與幫傭；還有，傳統而堅定的傳宗接代觀念，又讓本來不容易娶到老婆的族群，像是低收入的農民、勞工、老兵等，紛紛向東南亞與大陸娶回年輕健壯的妻子。人數最多的一年高達一萬人。最新的統計是越南人有20萬人，印尼人15萬人，泰國人與菲律賓人各有10萬人。粗略歸納，閩南人多娶越南人，客家人多娶印尼的客家華人，外省人和老兵多娶大陸媳婦，泰國移民多數是男性勞工，多在建築工地與大型工廠。

所以越南文《四方報》的讀者很多是配偶或看護，通常一個人在丈夫或雇主家裡，孤獨無助之人，如果再遭受虐待，就更需要外界的訊息和支持。所以《四方報》的大量讀者與投書來自她們。相反的，泰國勞工多數集體住在工廠宿舍，互相有照應，雇主再接個泰泰頻道電視，訂幾份泰文雜誌給他們看，就算已做到安撫情緒的義務。

是我們的家人，不是花錢買來的家電

張正攤開這期的《四方報》說，前面一半是台灣、越南與國際新聞，加上一些功能性的專欄，後半是讀者投稿的文章、詩歌、圖畫與照片。他們講心情、婚姻，罵老闆，還有逃跑專題。越南人很喜歡寫詩，七言或五言的詩或韻文，可能和他們50幾年前廢除漢字，將越南文字拉丁化有關。另外他們也很愛畫圖。將這些文章和畫作刊登出來，可以讓大眾了解他們不只是「掃地的」，他們也有七情六慾，受到虐待，也會背叛，也會逃跑。我們還有逃跑專欄呢！像這篇就是寫「我為什麼會逃跑？」上一期有一篇投書

講到，女雇主餓他吃威爾剛，把他當作性奴隸，他寫信來求救。這些受虐案件如果具體確實，我們會找一位越南神父處理，或是轉介紹給社福單位。因為如果介入太深，那官司打不完，要天天出庭作證！

張正感嘆的說：「生日快樂的稿件多到登不完，很多是祝福在越南的兒女。我後來比較能體會她們的心情：她們出來做工，沒辦法陪孩子一起長大，心裡很愧疚。幾年下來孩子都不認識媽媽了，很可憐。」

《四方報》還開闢交流版，讓越來越多的越南男性有機會認識同鄉，還開辦簡訊服務版，讀者可以用手機簡訊留下手機號碼和自我介紹，刊登一則收十元。另外也提供尋友、尋人、生日、交友等服務性版面。這些附帶人頭照片的彩色版面，讓四方報看起來親切可愛又溫馨，是主流報紙華麗的設計欠缺的人性與人味吧。

應該要學習的人是我們，一起來讀《四方報》

對於外籍移民和移工的處境和心情，其實台灣人也不陌生，二十幾年前吧，不是很多家庭的大兒子或大女兒提早就業或結婚，犧牲一人來改善家計，讓弟妹可以升學？很多人覺得他們製造社會問題，甚至於歧視他們貪圖錢財，其實這些來自東南亞的新移民和台灣的丈夫或是雇主是「和議制」，女方拯救娘家，男方得以成家傳宗接代，雇主也有了廉價而年輕的勞動力，產業不必遭淘汰，普通收入的女子可以支付2萬元月薪讓父母有人看護，不用花到本地看護的五六萬元。總之，台灣社會在走上真正歐美日的工業化與富裕之前，社會的很多破洞就由鄰國的兒女們填補。

總結東南亞移民對於台灣社會的影響，張正認為，對整體台灣來說，他們的到來是正面的影響多，因為他們年輕健全，對高齡化少子女的人口是能夠提高素質的。對於台商要前進東南亞投資也有幫助，因為跨國婚姻的子子女有親戚在當地，還會當地語言，甚至了解當地國情民心，這些都是省掉以往冤枉路的利多因素。

張正最後希望外配的先夫能夠和妻子一起看《四方報》，很多重要的好文章是有中文標題或是中文翻譯，可以了解她們的心情，文化，甚至也可學學她們的母語，讓家庭更溫暖和諧。「把她們當人看，而不是看做你買回來的家電，或是生育機器，對人的基本尊重自然就會產生啊！而且她們是來自詩畫的國度，也有悠久的歷史，優秀的文學與藝術成就，甚至還超越台灣許多，該多學習的人是我們啊！」張正說。

《四方報》的創辦人成露茜不幸已於今年元月辭世，張正認為，她所開創的新聞與教育事業應該要，也會堅持下去，因為那不是搞媚俗，不搞腥羶色的少數報刊了。

自信從容只往前看

對女報人成露茜的記憶和感動

文／陳慧敏

圖／四方報提供
聽到成露茜社長(Lucie)過世的消息，第一個反應就是：有人惡作劇嗎？直到上網讀立報社論和新聞，才確認這是真實的新聞事件。因為在腦海裡面的Lucie，總是精神奕奕地，骨癌早就康復痊癒，沒有一點病容。這樣生猛活力十足的人，怎麼就那麼突然地過世了？

讀了讀紀念Lucie的文章，總平板地描述—她永遠挑戰自我，辦破報、立報和四方報，接手傳記文學，辦社會發展研究所。堆疊起來的資歷洋洋灑灑，總覺得少了一點氣味，少了Lucie的樣貌，好生遺憾。

要我寫Lucie的模樣，我跟她的接觸不多，恐怕不深入。我「知道」Lucie超過十年，淵源是Lucie剛創辦社會發展所不久，我正在政大新聞所唸研究所，時常到社發所旁聽上課，反倒像半個社發所學生，甚至上過Lucie的社會發展理論。奇妙的是，我當時擔任研究助理，翁秀琪老師正在做成露茜、殷允芃等女報人的生命史訪談，也讓我間接透過書面資料去「知道」Lucie。

這些淵源都不足夠支撐我寫下對Lucie的全面觀察，然而，以她親炙學生的緣分，以身為記者成職志的我，卻很想寫下我對Lucie的幾幕記憶，還有她給我的深深感動。認識Lucie十多年，真的是直到2007年那一年，Lucie骨癌治療後回報社，我打從心底對Lucie作為女報人的性格，真真正正的尊敬和感動。

那一天，是我跟著Torrent和靜如等社發所畢業的學生，約好要探望骨癌病後的Lucie，還私下告知其他同學們「趕快來看社長」。事先跟她的秘書約了，知道Lucie從醫院出來，在家裡休養一段時間，一直待不住，提早回到報社和學校上班，於是，我們探望這位骨癌化療後的病人，不是在醫院或家中，而是約在學校的辦公室。

Lucie走進來小會議室，巍巍顫顫，走路不太穩，隨時都怕跌倒，但她戴著帽子，穿得



四方報紀念成露茜的專題

光鮮亮麗，沒有倦容，帽子是因為她做了化療，頭髮少了才戴上，她貼身有位看護，怕她隨時都可能跌倒再骨折，所以看護像她的保姆，看顧她，熱愛工作的Lucie—忙起來，就忘了休息，所以，看護更像親人，隨時要提醒她要吃藥，甚至要催她歇一歇，拉她回家去，也在她走路時候，盡量伴著她，讓她不受傷。

她慢慢移動，坐進位置，沒有等我們開口，她自己報告「病情」。她說：「你們也知道我的那個情況，就是之前骨折住進醫院，才發發現的，後來就做了治療，現在情況還不錯。」兩三句話就跳過了這個生死關卡的大問題，壓根就没提過癌症兩個字。

她不談自己的病情，我們也不好圍繞著病情談話，她隨後就開始轉向我們身上，她問問我們，現在都忙些什麼、做些什麼、想些什麼，耐心而專注地傾聽，滿心歡喜的模樣，當時恰逢樂生抗爭等幾個社會運動的事件，她完全知道狀況，我們驚訝地反問：「所長怎麼都知道？」她說，因為自己都有跟隨著進度，除了看新聞，也上網看論戰和討

論。她甚至還從理論思考的層次，問我們，幾個社運的事件是不是有辦法用大論述統合起來，串聯起來？這是不是一個可能性？

仔細回想，Lucie提問的這個大問題，也不是第一次問我們。早在她社會發展理論的課堂上，早在我學生時期參與苦勞網的期間，Lucie都不忘在聊天的時候，問問這個問題：這麼多的社運事件，是不是會有大論述的可能性？我想，這是她對台灣社運的關懷和思考點之一。

然後，讓我驚訝的是，我們的話題一轉，她問：「你們對發行網路版的想法是什麼？紙本還有用處嗎？怎麼看待網路媒體？」她說，她正在思索立報和破報不發紙本，改用網路發行的想法，畢竟，立報破報的經費有限制。

她跟我們討論這些問題的時候，沒有一點病容，好像眼前的她，從來都沒有得癌症，她滿腦子思索立報和破報的發展方向，儘管她連走起路都那麼脆弱不堪，她的精神卻充滿力氣，沒有行將就木的驚慌和焦躁，沒有趕著要將自己一生榮耀論定的虛榮。她的樣子，從容不迫的，只往前看，那麼篤定而自信。

那天，她唯一的「往後看」，就是起身帶我們去看她主導規劃，甫完成的成舍我紀念館，看爸爸的歷史。她帶我們走了一圈，一一講解館內珍藏的歷史文件。印象最深的，是Lucie指著幾張圓滿紅字的報紙，說到成舍我辦報，自己必定是第一個讀者，每天仔細讀報，然後再用小條子寫下自己的意見給記者或總編，當時童年的Lucie就陪著爸爸看報，爸爸定了一個遊戲，就是找到錯字用紅筆圈起來，可以發一元獎金，Lucie常為了拿獎金，就看報找錯字。

Lucie站著陪我們看完完整段成舍我生平的介绍影片，影片的時間可能有十幾、二十幾分鐘，我不斷擔心Lucie是不是可以久站，但

她充滿興致，影片拍攝成舍我先生在大陸開辦20多個報紙和媒體的歷程，以及台灣後，擔任立委直言不諱，開創新聞教育一世新的格局，甚至，成舍我先生直到台灣在1988年報紙解禁，以90歲高齡重新開辦立報，甚至還自己出去跑新聞，影片中的受訪對象說，他可能全世界最高齡的辦報人和最高齡的記者，直到94歲高齡辭世，從事新聞工作共八十多年，更可說是資歷最長的新聞工作者。

看著成舍我的一生，才感覺到Lucie接下報業的感情之深，肩負責任之重，傳承意味之濃。也隱然體會到，Lucie對生命和工作的堅強和韌性，也來自成舍我先生。

作為記者，作為她的學生，就在那一天，我深深感覺到她作為女報人的堅持，也體會到所謂的實踐，就是她在跟身體健康拔河之際，仍有那麼強的意志力，不太在乎自己的病痛，而更擔憂報社的預算經費，思索報社的發展和未來。這樣堅強的韌性和意志力，是Lucie最為人感動和佩服之處。

2008年12月，Torrent要申請學校出國，求教Lucie，也請她寫推薦信。她在辦公室裡，微笑地回答申請美國社會所的種種詢問，她桌上堆著一疊學生論文，正打算要批閱，回答問題當中，她輕巧地起身，從書架上找資料，聊天過程，她說那段時間前後，已去了幾趟香港和大陸，主要是跟哥哥成思危碰面，也到大陸去看看，還笑著說，因為成思危的維安等級過高，隨身有一大堆公安，出門浩浩蕩蕩，實在不方便，後來還是改約在香港碰面，沒有公安隊伍，比較方便。這時候的Lucie，走路輕巧靈敏，完全沒有前一年化療模樣。退出辦公室，我們小聲交換意見：Lucie從骨癌康復了，這麼神奇，整個人精神奕奕地。我完全相信，這是Lucie的意志力完全戰勝了病魔。

Lucie辭世短短幾個小時，維基百科已旋即加入此消息，好像就開始讓Lucie走入「歷史」，成為歷史人物。Lucie作為立報、破報和四方報的社長，自然有傳播學者用嚴謹的研究，為她定位。但是，在我的心裡面，Lucie作為女報人的格局和氣度，就展現在那一天的探望，她不自覺地流露出的堅強和從容，以及帶我們進入成舍我辦報歷史的深情凝視，以及孜孜不倦於工作的每個當下。



四方報編輯與志工參加工運遊行



青年成露茜

為中國造血的世紀老人

文／曲志紅（新華社記者）

初秋的和煦中，聽侯老娓娓講述他的人生，是一件幸福的事。老人臉上那溫暖的笑容，眼睛裏清澈的目光，平和的話語間流露出的熱烈——這一切，讓人不由自主地屏住呼吸，隨著他一起，詠歎！

和中華民族一起走過20世紀

侯祥麟講了一件他終生難忘的事情：1945年的一個夜晚，那是在他赴美留學的途中，船順著印度洋南行，等跨越赤道，晚上，年輕的侯祥麟睡不著覺，在甲板上散步，仰望浩瀚的星空，突然看到了南十字星座，欣喜萬分。侯祥麟以前就特別喜歡看星星，認識了許多星座，但那時只能看到北半球的，南半球的星座看不到。那次竟然在太平洋上看到了，這是他多少年的嚮往！

他告訴記者：「當時的驚喜真是無法言喻，就像你很想得到一件東西，很多年沒有得到。突然得到了，能不驚喜嗎？在科學研究過程中，每一個難題的攻破，都會伴隨著這樣的驚喜。那是需要無數次挫折失敗，不斷探索尋找才能得到的。現在我已年逾九旬，能和中華民族一起走過20世紀幾乎全過程，能投身新中國的石油石化事業，站在新世紀的起點上，人生的風風雨雨都已成爲過去，我的心境一片明朗和寧靜。」

大愛無形：「沒有遺憾」的悲喜人生

對於侯祥麟這樣「見證了歷史並以個人之力參與其中」的世紀老人來說，人生，已經厚重得像一部巨著。其中，有近百年的風雲際會，



溫家寶總理採訪侯祥麟

有跌宕起伏的艱苦征程；有堅定的信仰，有不懈的追求；有筭路藍縷、負重前行的甘苦艱辛，也有建功立業、報效祖國的榮耀和輝煌。

與石油「結緣」的不老人生，也許我們可以用下面的兩個比喻來概括他的人生：如果說二十世紀是華夏五千年歷史長河中的一處「險灘」，他就是挺立在這段激流中勇敢的弄潮兒；如果說石油是共和國生生不息軀體裏的「黑色血液」，他就是源源不斷為之輸送「新鮮血液」的「造血人」……

回顧經歷過20世紀60年代能源短缺時期的中國人，都不會忘記這樣一幕：走在街上，一輛輛無油可用的汽車頂著沉重的煤氣包，像負重的老牛一樣喘著粗氣……此刻的新中國，正面臨著由於中蘇關係緊張而引起的全國性「油荒」，急需維持國家運轉的「血液」。更嚴重的是，關係到國防安危的空軍部隊也因缺油無法起飛。毛澤東主席為此

憂心忡忡地感歎：「天上飛的，地上跑的，沒有石油是轉不動的。」

大慶油田的發現解決了原料問題，但怎麼把這些黑糊糊的原油變成能讓汽車跑起來、戰機飛起來的燃料？時任石油科學研究院副院長、石油工業部新型材料領導小組副組長的侯祥麟接下的，是刻不容緩的如山軍令……

但科學研究不像衝鋒、占山頭這麼痛快淋漓，反反覆覆的失敗，通宵達旦的試驗，高度危險的工作環境……憑著背水一戰的決心和常人難以想像的艱苦工作，侯祥麟和他的同事們在短短的5年時間裏，先後成功開發了五項關鍵的煉油新技術並實現了工業化，比原計劃提前了7年，使中國本來十分落後的煉油工業技術以最快的速度接近了當時的世界水準。汽油、煤油、柴油、潤滑油等4大類產品產量自給率達到100%，結束了中國人民使用「洋油」的歷史。

油煉出來了，接下來要解決的就是怎麼「用」。到1978年底，中國原油產量首次突破1億噸，但此後的幾年卻徘徊不前，而國民經濟對石油的需求卻增長迅猛，產銷矛盾日益突出——「如何用好1億噸原油」，成為中國高層領導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密切關注的課題。此時的侯祥麟已經是石油工業部副部長，主抓科技工作，根據自己多年的思索以及多名專家的調查研究，他提出了「把大型的煉油廠和以石油為原料的化工廠實行統一指揮、統一銷售、統一外貿，同時加強原油深度加工」的理論。

93歲高齡還在勞動中的侯祥麟

1981年12月，這份名為《關於如何用好一億噸原油的意見》的報告出現在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的案頭，胡總書記閱後批示：「印成政治局參閱檔，併發省市黨第一書記座談會同志看看，目的是為了增加知識，開闊眼界。」而這份報告中提出的整合中國石油企業、對有限的石油資源「吃乾榨淨」的整體思路，至今仍深刻影響著中國石油工業的發展方向。

他的一生沒有廢話，也沒有廢事

縱觀侯老的人生歷程，你也許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理解上面的這段話，那就是：他一生想做、該做的事情太多，也就沒有時間去做廢事、說廢話了。

1912年出生的侯祥麟生於亂世，長於革命運動風起雲湧的新時代。少年時期，他最愛看的書是《三國》和《水滸》，那些忠君報國、捨生取義的英雄好漢讓他感佩不已。而上學之後。他又經歷了轟轟烈烈的抗日浪潮和「五·四」思想解放運動，「救國」、「報國」從此成為他追求的人生目標。

中學時代，一堂講述原子能的化學課改變了侯祥麟的人生道路。當他在課上知道原子核中蘊藏著巨大能量、釋放出來會產生巨大威力的時候，感到非常震撼和激動，開始憧憬著將來研製原子彈對付日本侵略者。雖然很久之後他才搞清楚原子核是物理學，不是化學，但少年一時幻想卻讓他迷上化學，並決心把研究化學作為自己終身的事業。

侯祥麟青年時代的另一個人生抉擇是加入共產黨，1938年4月，也就是全民抗戰爆發後的第一個春天，熱情激進、對美好新社會充滿嚮往的侯祥麟秘密入黨，成為中國共產黨最早的紅色科學家。這段「激情燃燒的歲月」定下了侯祥麟一生的基調：「年輕時的動力來自愛國救國，想走科學救國的路。後來信仰馬列主義，追求一個理想的社會。當然距離目標還很遠，但要從點點滴滴的事情做起。」

從此，侯祥麟不再是孤獨的愛國知識份子，伴隨著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壯大，他始終行走在時代的前列沒有掉隊，成長為新中國科技事業的締造者之一。

「我和祖國一起走過了20世紀幾乎全部的歷程，作為一個中國人，我為今天的祖國感到驕傲；作為一個有60多年黨齡的中國共產黨員，我對自己的政治信仰終身不悔；作為一個新中國的科學家，我對科學的力量從不懷疑，我為自己一生所從事的科學工作感到欣慰。」

一路走來，他所有的光榮與夢想，獻給了民族復興、強國富民的偉業；而他所有的痛苦、哀傷和遺憾，卻留給了自己和家人。深藏著人生的大風大浪，大悲大喜，他沉靜若水……「人生的風風雨雨都已經成為過去，我的心境一片明朗和寧靜。」

這些快慰之事，侯老在不同場合講過多次，每次都神采飛揚。老人說，親歷了災難深重的中國翻覆地的巨變，並在其中盡到的一份力量，人生足矣。在這個「足矣」背後，是他在這條坎坷道路上70多年的跋涉，是自己青春、才華、心血和生命中幾乎一切最重要東西的奉獻，對此，侯老無怨無悔。



黃榮燦和他的時代



六張犁公墓墓群中的黃榮燦墓碑

文／人民e

「歷史卻要新的現實主義的美術在中國茂盛，因為我們應該非服務現實的理想，去改造現實生活的一切，提高到一個健壯的全體不可」——黃榮燦《新現實主義美術在中國》一九四六年

編按：這篇文章是2002年《黃榮燦與他的時代》紀念座談會（3月2日上午，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主辦，台北市清華大學月涵堂）的記錄稿。這場座談會邀請了當時正在台灣訪問並發表新書《南天之虹》的橫地剛先生、民眾史作家藍博洲先生、彰師梅丁衍教授，並由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曾健民先生主持座談會。與會的來賓與青年學子在會上展開了深刻而饒富興味的對話。

藍博洲：黃榮燦的木刻版畫為二二八留下歷史見證，其生平真相值得探討

「是什麼樣因緣而促使我開始研究黃榮燦的呢？」藍博洲首先做了開場白。他表示，黃榮燦是第一個在《台灣文化》介紹魯迅的人，而七十年代的《夏潮》雜誌常常刊出珂勒惠支的木刻版畫作品，雖然當時並沒有意識到珂勒惠支的作品在三十年代的意義，但在日後對台灣五十年代白色恐怖的調查之中，其思想上從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乃至七十年代之間的內在聯繫就不斷地突顯出來。而且，由於自己長時間地進行台灣民眾史田野調查的緣故，有相當多的機會可以到海峽彼岸去探訪當年的歷史見證人，其中尤其令人耐人尋味的，就是周青先生關於黃榮燦是「雙面諜」（按：在周青先生逃往大陸的船上，他曾見到黃榮燦一面，但他赫然發

現黃榮燦胸前卻掛著特務機關「警備總部」的徽章）的說法。這麼一來，這位既有可能是特務、但卻又為二二八事件留下歷史見證，為兩岸美術交流做出如此重大貢獻的黃榮燦先生，就更值得令人去探求其生平真相了。

梅丁衍：除了美術，對人權問題的關注是推動我追查黃榮燦生平的主要原因

對黃榮燦生平作長期研究的梅丁衍先生則表示，在他於馬祖服役期間，曾因被懷疑思想有問題而被囚禁兩個月，從而在情感上埋下了在日後研究同是白色恐怖受害者黃榮燦生平的種子。當完兵之後，去美十年，在美國期間曾經擔任一家中文左派報紙的美編五年，也因為身處國外的緣故，所以可以接觸到一些島內被查禁的刊物。但即便如可以看到那些刊在《夏潮》上的、包括《恐怖》的檢查》在內的小木刻畫，他自己仍始終不相信二二八這件事是真的。自八十年代起，他開始與大陸的版畫家通信，知道了有黃榮燦這個人的存在。而九十年代六張犁墓群的發現，以及安全局檔案的曝光，更幫助了梅丁衍展開更為深刻的研究。從而，圍繞著黃榮燦為何被殺、如何被殺、什麼人又因為他而被殺的幾個問題就逐漸浮現了答案。梅先生說，對於這個問題的研究，除了前述關於美術以及其他方面的機緣以外，對人權問題的關注是推動他追查下去的最重要原因。

橫地剛：戰後四年是台灣與大陸快速合流的年代，如何繼承五四精神始終是台灣文化界的中心課題

作者橫地剛先生則從他自己的生平開始談起。他首先說，自己是屬於「安保世代」的一員，差不多就是現在六十歲上下的日本人。至於為何開始接觸中國事物，他說，那是從學漢語開始的，在當時的氣氛下，學漢語就會被看成是共產黨。但在當時，教漢語的老師全來自台灣，講中國文學卻絲毫不提魯迅等左翼作家。於是乎，他們同學之間就開始自己編寫教材。在安保之後，全日本陸續成立中國研究會，對中國的興趣日益增加。到了文革時期（1966年），由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路線的徹底分裂，全世界的共產黨都得選邊站，日本共產黨此時也與中共分道揚鑣。橫地剛先生說，在日共與中共關係還相當好的時候，日共的學生黨員會覺得學漢語而學中國歷史的他們很蠢，他們說，何必研究那些，要研究就研究毛澤東就好啦！

可是到了文革初期，日共與中共翻臉的時候，日共底下的一些學生卻又開始反對中國。橫地剛先生說，那些昨天才叫他不要看孫中山、去看毛澤東的那些人，今天卻開始反對起毛澤東了！他覺得這些學生實在是沒思想、沒學問。日共學生去打中國在日華僑的時候，甚至寫出這種條幅：「清國奴毛澤東」，所以他自己始終拒絕參加日本共產黨，就是看穿這些號稱共產主義者的骨子裡實際上還是有日本軍國主義者的「清國奴」思想。

1967年他首次前往大陸，當時他就結識了許多台籍幹部。住在北京一年多，當時正是運動最火熱的時候，每天從早到晚都是大字報小字報的，他自己亦從而體會到了大部分日本人不會了解的中國文革。大學畢業以後，他就開始了透過貿易而搞日中之間的工作。而台灣問題則是從他過去的台灣漢語老師的教材中得到一些基本的印象。台灣有五十年是日本的殖民地，後來又成為美國的反共基地，所以台灣有整整一百年的時間與大陸對立著。但這其中有四年，就在1945到1949年之間的那關鍵四年，是台灣與大陸之間在各個領域均快速走向合流、走向一體化的年代。

1964年起，橫地剛先生則又在日本以及大陸陸陸續續地認識了曾在黃榮燦的人生道路上有交錯的人物，包括在台灣與黃榮燦共同開設三聯書店分店的曹健飛，還有共同參與《人民導報》的莊德潤等先生，這些人都成了橫地走向研究黃榮燦生平的重要因素。橫地剛先生感性地說，從他第一次看到黃榮燦先生的墓碑到現在，其間認識了吳克泰、陳炳基、林書揚等先生。他能看到這些資料與見證人，沒別的理由，應該就是黃榮燦先生的靈魂在指引吧！

吳克泰：黃榮燦不是警總的特務，也不是共產黨員，卻比共產黨員的作用還大

而內戰期間，在台北被稱為「學運四巨頭」之二的吳克泰與陳炳基兩位老先生，也特別趁著回台探親的期間，來到這場座談會。吳克泰先生說，1946年四月中，台灣社會就已經開始不穩，透過友人的介紹，他認識了在新創造出版社工作的黃榮燦。吳克泰特別表示，黃榮燦「絕對不是特務」，他趣味的說，當時與他同船前赴大陸的周青，不了解內地風雲變幻的鬥爭形勢，所以才會憑著警總徽章就判斷「黃榮燦是特務」。吳克泰先生還說，在當時的台灣，國民黨省黨部比陳儀還要可惡，陳儀是魯迅的朋友，所以才會請到許壽裳先生來台講，來當台大校長，可就是受到國民黨C C的阻撓，導致許壽裳不但當不成校長，最後還死在國民黨法西斯特務槍下。二二八的時候也是這樣，陳儀本來要講話，結果柯運芬竟然在長官公署

上對群眾開槍，全島至此才全面峰起。

至於黃榮燦是不是共產黨員呢？吳克泰先生作出了以下三點分析：首先，沒有證據顯示他就是共產黨員，如果是，不可能會有橫的聯繫（按：所謂橫的聯繫指的就是除了對上級領導與下級幹部之間的聯繫之外，還能與同樣也被同級領導的黨員作接觸）；在安全局文件裡，他的資料也沒有入黨介紹人的姓名資料（然而這是被當作匪諜而逮捕的必填資料之一）；最後，他也向知情人士求證過，所以黃榮燦先生應該是組織外的人。「他不是共產黨員」吳克泰先生激昂的說「卻比共產黨員的作用還要大！！！」

橫地剛：台灣青年須要繼續擴大地圖，要看到整個中國、整個世界

橫地剛先生又做了一些補充，他說，從抗戰結束前的《文化界時局宣言》到楊達在1949年所發表的《和平宣言》其中貫穿的是一貫的思想。台灣是日中矛盾最集中的地方，如何「繼承五四運動精神」，始終是戰後四年裡台灣文化界的中心課題。而他自己作為一個日本人，通過了解台灣殖民地問題、兩岸問題，發覺到，在研究的視野上，必須要「擴大地圖」，在這方面，歷史、地理都是相當必要的。而他自己通過了與藍博洲、梅丁衍等先生的交流，終於完成了這本書，擴大了這面地圖。

最後，橫地剛先生也提出了他對台灣青年的期望，他覺得，當代台灣青年還是需要繼續「擴大地圖」，除了看到台灣以外，更要看到整個中國、整個世界，開闊的視野，才能不為侷促的視角所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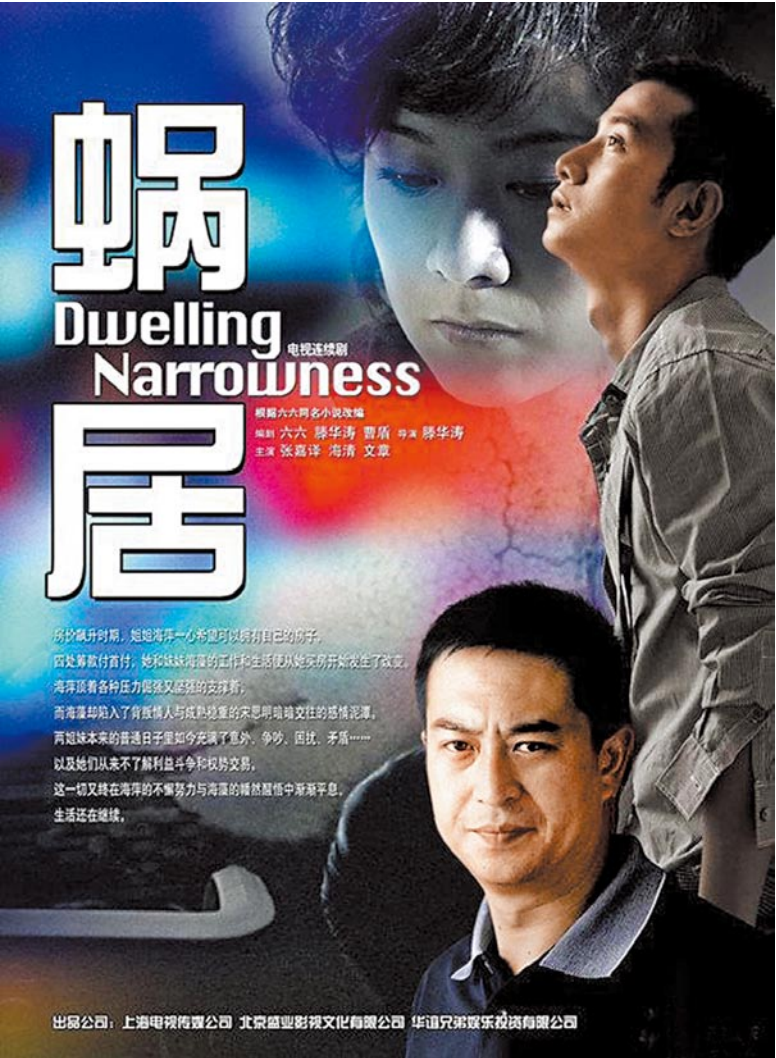
整場座談會在中午十二點整結束，會後橫地剛先生隨即返回日本福岡，完美地結束了這趟訪台之旅，為中日文化的進步事業，更添上了光彩而動人的一筆。回顧過去，縱使中日之間有這樣那樣的歷史悲劇糾結在那兒，但展望未來，只要中日兩國都能有像橫地剛先生這樣進步的文化人，中日兩國人民，必能在嶄新的世紀裡，攜手開創更美好的未來！

黃榮燦的木刻作品二二八事件



寫實劇創下高收視

《蝸居》引發社會省思



寫實的感情 是《蝸居》引發共鳴的原因

文／新高
沒有離奇的戲劇衝突，沒有誇張的巧合，也沒有偶像和大腕（大卡司），只是一齣反映房價飆升、人們在都市生活中歷經的種種波折的都市情感劇，《蝸居》在上海電視台播出後，不僅收視率一路高升，創下同期收視新高，更引發百萬網友的討論，「今天你看《蝸居》了嗎？」成為白領一族的熱點話題。

平實故事 熱點題材引發大共鳴

房價漲幅一直是大眾的焦點話題。《蝸居》從人們對房子的渴望談起，講述了一對姊妹在金錢、物質的面前所表現出的不同價值觀以及她們在大都市中生存的辛酸成長經歷。該劇在7月27日上海電視台播出後，僅用四天便創下收視歷史新高，又恰逢近日全國各城市迎來新一輪的地產漲價風潮，《蝸居》涉及的熱點題材強烈地引發了大眾的共鳴。

「這戲太殘酷了，看得讓人心疼，可就因為它真實，我每一集都看！」為了買房只吃方便麵，這種情節有什麼好寫的。可是，我哭哭了！」「看到海萍與女兒邊通電話還要控制電話時間，這場面實在讓人禁不住要落淚，我也是個白領的母親啊」……

平實的故事、普通百姓生活的真實再現，正是《蝸居》緊緊抓住觀眾的原因。一位姓張的資深發行專業人士表示，《蝸居》的走紅，不僅僅在於它選取的題材，更重要的是它如實地反映出現實生活中人們的內心狀態。「有的電視劇為了好看，設計了許多矛盾衝突，甚至一些莫名其妙的巧合，而《蝸居》的創作恰恰摒棄了這些，它細膩地捕捉到一個外鄉人在大城市求生的各種細節，柴米油鹽瑣碎日子中的平淡，我們每個人身邊都有這樣的朋友，觀眾看到的不是海萍跟海藻，而是我們身邊真實存在的朋友搬上了螢幕，這才是《蝸居》在網絡論

壇引發大討論的原因。」

不僅題材寫實 感情也要寫實

《蝸居》在電視劇類中成為人氣最高的論壇熱帖之一，大家對劇中人物的評論都帶著明顯的愛恨情感色彩，甚至還拿一些社會公人物對號入座。對此，編劇六六解釋，她在劇中並沒有暗指諷刺誰。「如果誰是劇中原型，可以說誰都有可能。海萍對房子的渴望、海藻對愛情的背叛、宋思明的矛盾、小貝的失戀痛心，我們每個人可能都會經歷過這樣的情感糾葛，看著看著你可能就會想，宋思明像誰或誰，海藻又怎樣怎樣，其實觀眾有這樣的想法我挺高興，說明我寫的成功，人們認為真實。」

該劇是編劇六六、導演滕華濤繼《雙面膠》、《王貴與安娜》後的第三部聯手之作，相對前兩部作品的單一講述兩口子之間的小情小愛，《蝸居》則大手筆地融入更多時代背景，包括政商關係、放欠款、中年婚姻危機等，用簡單一個買房的緣由將三個家庭複雜地串聯在一起，從而表現出都市現代人的困惑與迷茫。

劇中角色由諸多實力派演員擔綱，塑造出各類典型人物。先前憑藉《雙面膠》、《王貴與安娜》的出色表演，躍身成為一線演員的海清，在本劇中飾演一位性格剛強、精打細算的普通小職員，由於她堅持在上海買房落戶，逼得丈夫極其無奈，甚至被迫去借高利貸；張嘉譯與鄧超梅飾演的夫妻則過著「雞肋」式的婚姻生活，丈夫的出軌，讓鄧超梅倍感女人四十的無奈；張嘉譯飾演有權有勢的宋思明與文章飾演的青春、感性、對愛情執著的小貝，兩人之間展開的情敵較量堪稱是全劇的精彩之筆，社會地位的懸殊，讓單純的愛變的苦澀現實。

戲劇承載人生也反映時代

《蝸居》日前在上海台播出已經過半，收視率每天呈現出節節高升的走勢，業內人士分析說，隨著情節的推進，人物命運的結局將是觀眾最渴望看到的部分，大結局的收視率將突破預期，為該劇畫上完美句號。收視的飄紅給《蝸居》在11月全國各大衛視的播放，無疑打

海萍與丈夫，都曾擁擁有夢想與熱情，但為了買房，鬱悶與爭執成了這對白領夫妻的家常便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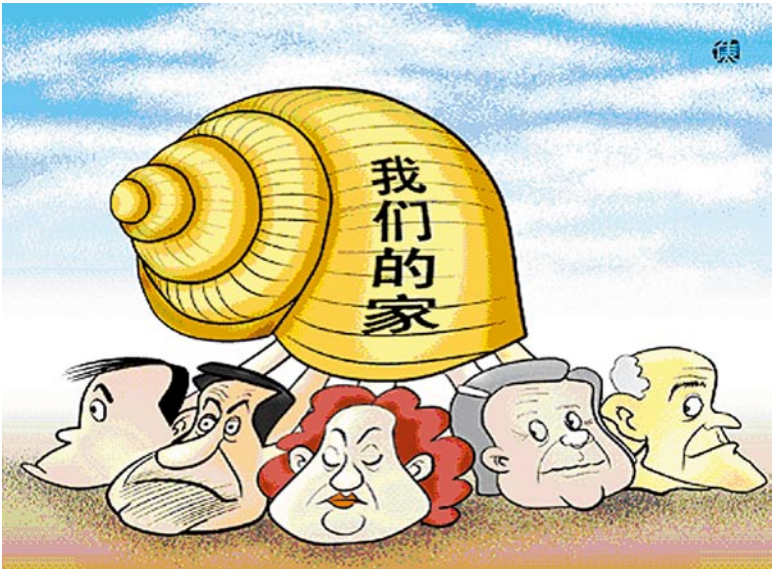


下了一個良好的口碑基礎。在談及該劇的銷售發行時，出品方之一的金盾影視公司的負責人表示：「投資追著編劇，編劇捆綁導演，多實力演員欣然加盟，一部戲能捧紅一個實力演員，這樣有品質保證的電視劇近些年來不多見。能搶到《蝸居》這樣好的作品，我們覺得非常高興，當然也是編劇六六、導演滕華濤對我們的信任。今年建國六十周年，《蝸居》雖然沒有用戰爭、歷史來反映祖國的成長，但從百姓的點滴生活側面，一樣體現了國家的繁榮，以及中國人在面臨困境時自強不息的勇氣。這樣的故事在衝擊人們心靈的同時也能夠讓人自省，從而巧妙地傳達了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隨著全國各大衛視的上星播出，相信《蝸居》將會在全國產生較大的反響，所以選擇投資這樣的電視劇，我們覺得非常有意義。」

「你抽一輩子煙就燒掉我半套房！」
「男人做事漂亮不漂亮是一回事，說話是一定要漂亮的；女人齷齪不齷齪是一回事，舉止是一定要文雅的，這就是生存法則。」
「人的偉大，不在於你為社會做了多少貢獻、有多少成就，而在於你面對誘惑的時候，懂得犧牲！」
「一個月工作22天甚至更多，像牛一樣地工作一個月，而像小兔子一樣歡蹦亂跳的日子只有發薪的那一天。人要用30天的緊張換一天的鬆弛，這種現實也太殘酷了吧！」
「幸福是放心底的東西，是一種信任，願意生死與共。也許平時並不覺察，但到關鍵時刻就會跳出來，讓你感受。」
「現在的房價是沒有最高，只有更高，不斷的更高，越來越高」

《蝸居》經典對白

大陸的戲劇向來有寫實主義的



《蝸居》引發共鳴，也成了網路與媒體的熱門話題

做人難，做城裡人更難

作者／羅加鈴

位於雲南西北的麗江，由於風景優美，民風古樸，曾經讓我動了在大陸買房的念頭。還記得，2001年時，一棟具有四十年歷史的四合院僅要價人民幣10萬元。當時雖然心動，卻因種種考量沒有出手，後來聽說屋主急於搬遷，最終以人民幣9萬元賣出。2008年夏天，我再次到雲南作田調，駐足在這間與自己擦肩而過的房舍前，陪同的朋友以惋惜的口吻告訴我：「這房子現在值60多萬元，先前你若買下，現在可安逸囉！」

做人要作城裡人

朋友來自農村，從事苗繡生意，總認為城市裡處處充滿著農村所欠缺的「先進」與「文明」，認定「做人一定要作城裡人」。十五年來，他從上海、江蘇等地一路跟著旅遊熱轉戰至昆明，最大的心願就是要在大城市裡有自己的一套房子，因為有了房子才算有家，才是城市裡的一份子。然而，在這個房市飆漲的年代，即便打拼多載，他存錢的速度從來都趕不上房價上漲的速度。

其實，朋友的例子並不特殊，這樣的狀況存在大陸各地，某些相對發達的大城市問題更顯突出。例如，廣州市國土資源和房屋管理局所公佈的「2009年12月廣州市十區房地產交易登記情況通報」中就顯示，2009年12月一手住房交易的平均價格為人民幣11263元/平方米〈相當於一坪台幣16萬元左右〉，比2008年同月份上漲40.6%；而根據國家統計局的調查報告卻指出，當地居民的工資增長率僅約10%，難怪廣州63%的白領階級表示自己是「月光族」〈月底薪水就花光光〉，買房根本是一項不可能的任務。

高學歷低收入的蟻族

所得增長與房價上漲失衡的問題，雖然牽動著每一個城市居民，但是壓力卻因人而異。土生土長的城市居民也許還可以與父母同住，問題是中國大陸現有一億〈農〉民工進城，而房價飆升的結果，許多異鄉客只能擠身於狹窄的租房。舉例來說，距離北京市中心20公里的海澱區唐家嶺村，原本是五環外的一個約莫三千人的小村莊，由於都市拉力的結果，外來人口已突破五萬，當地村民為此不斷新〈擴〉建房舍，滿足外地租客的需求。這些外來租客多數持有大學文憑，但因收入與住房價格比例懸殊，僅能選擇居住於北京市郊的廉租房，每人平均的使用空間



海澱區唐家嶺村的蟻族聚集區



住在北京的蟻族

為3-5平方米〈約為1-1.5坪〉，廚房和廁所還必須與許多人共用。

2009年9月出版的《蟻族：大學畢業生聚居村實錄》一書中，就對唐家嶺的住宅條件作出深刻的描述：

「到站下車，他清醒了：『那哪裡是北京啊，真是髒亂差！』他看到狹小的街道上，車輛來回穿梭，裹起一團團的塵土，籠罩著一旁各種各樣的小店，有的店招牌已經掛了很久，來一陣風便搖搖欲墜。租房的小廣告貼滿了電線杆和目力所及的牆壁；抬起頭，還是大大的廣告牌，寫著「招租」二字。沒走幾步路，不知從哪兒飄來的一個白色塑膠袋纏在了腳底。」

跟著別人在蜿蜒的小巷子裡繞了五分鐘，來到他未來的屋子裡，洪建修一下就愣住了：一房裡只有一張硬板床。空蕩蕩的屋子裡，什麼別的擺設都沒有。這樣的一間房，二百八十塊一個月，他和一個同來北京的朋友合租。屋裡沒有衛生間，他每天都不得不去一個公共廁所——「熏死人不會命」，洪建修說，在裡面待五分鐘再出來呼吸新鮮空氣，就知道什麼叫做幸福。」

「蟻族」多半是台灣人所說的七年級生〈相當於大陸所提的80後〉，基本特質是：從外地〈尤其農村〉到大城市打拼、高學歷、低收入〈約莫2000人民幣/月〉、工作缺乏合同，為了降低生活開銷，通常居於城鄉交界處，久而久之自成聚落，因其聚居形式與耐力能力如同螞蟻，便被稱為蟻族。

過年如過關的恐歸族

大陸這幾年暴紅的連續劇《蝸居》，就是以蟻族的生命經驗為背景，探討目前的高房價問題：一對復旦大學畢業的伴侶，即便留在原鄉的生活〈存〉條件相對優渥，仍然選擇要在城市生根，甘受城市生活的磨難，期望在城市裡安家。小倆口為了早日存夠頭期款，省吃簡用，從戀愛、結婚，到小孩出生，都住在十幾平米的租賃閣樓，最後雖如願購屋，卻仍受制於城市生活的壓力，女主

角「海萍」在搬進購入的房子後，還繼續擔憂著：

「每天一睜開眼，就有一串數字蹦出腦海：房貸6000，吃穿用度2500，孩子上幼稚園1500，人情往來600，交通費580，物業管理費340，手機電話費250，還有煤氣水電費200……也就是說，從我甦醒的第一個呼吸起，我每天至少要進賬400，至少；這就是我活在這個城市的成本，這些數字逼得我一天都不敢懈怠。」

蝸居這個由小說改編的電視劇，曾經創下超高收視率，許多觀眾心有戚戚焉，因為故事內容貼近他們的實際生活——「房奴問題」，也因而引發居住權益的熱烈討論。我有許多朋友，就是名副其實的蟻族，他們過年多半不敢回家，因為在他們的家鄉，考上大學象徵階級翻身的開始，當年親友們全體動員，湊齊學費供他們進城上學，為的就是希望他們有「非凡的」成就，所以過節這種親友齊聚、分享成就的時刻，往往讓他們倍感壓力，能逃則逃，變成了一個名符其實的「恐歸族」。

他們常常對我說，一個「名牌」大學的畢業生，總不好意思告訴親友：「在城市裡住的地方比家裡養豬的地方都小，而且連個衛生間都得共享，不如老家還有私家茅廁。更何況，回家總得回饋送禮，每回一次家，荷包就得大失血一次，明明沒錢還得充胖子，就乾脆找個理由別回了。」

住宅問題與社會政策脫勾的惡果

從表面上來看，大陸日益嚴峻的住房問題與城鄉發展失衡脫離不了關係，是城市的基礎建設跟不上農村剩餘勞動力的湧入的必然結果。但如果深究其政策根源，又與多年來重經濟、輕社福的政策傾斜有關。當住宅問題與社會政策脫勾，不再被視為是勞動力再生產所必須，而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環款，省吃簡用，從戀愛、結婚，到小孩出生，都住在十幾平米的租賃閣樓，最後雖如願購屋，卻仍受制於城市生活的壓力，女主

略，過度寬鬆的貨幣政策導致大量的信貸資金流向房地產，擴大了資產泡沫化的風險。根據中國社科院研究員曹建海的估計，2009年1月至11月投入房地產的資金高達4.8兆人民幣，其中來自銀行信貸的資金就約達3兆人民幣。如此一來，政府在「調控房價」和「資產泡沫化」之間陷入了兩難：一方面不希望飆漲的房價影響經濟增長的質量，並引發社會的不滿；一方面經濟增長又有賴於房地產產業的暢旺來拉動。

再者，土地出讓〈租〉，一直是地方政府很重要的財政收入，因為土地出讓金普遍占有地方財政收入30%以上，而許多地區甚至有60%至70%的建設資金依靠土地出讓〈租〉所得，所以地方政府當然希望建商可以支付較高的價格。想當然爾，這些高出來的部分最後就被轉嫁到消費者〈購屋者〉身上，使房地產價格陷入只升不降的惡性循環。這種無視住宅的社會功能，僅片面強調住房的財政功能，加速了住宅問題的惡化。

從居住權入手才能解決問題

根據北京市統計局2009年的統計資料顯示，北京職工的平均工資大約是人民幣5萬元，而購買一套五環〈已是城鄉交界區〉周圍約20坪大的商品房〈目前平均單價為每坪5.1萬元〉需要人民幣102萬元。也就是說，一個每月薪資超過人民幣4千元的人都要不吃不喝20年才有能力購買一間公寓。那麼蟻族、蝸居者，以及恐歸族，這些人應該怎麼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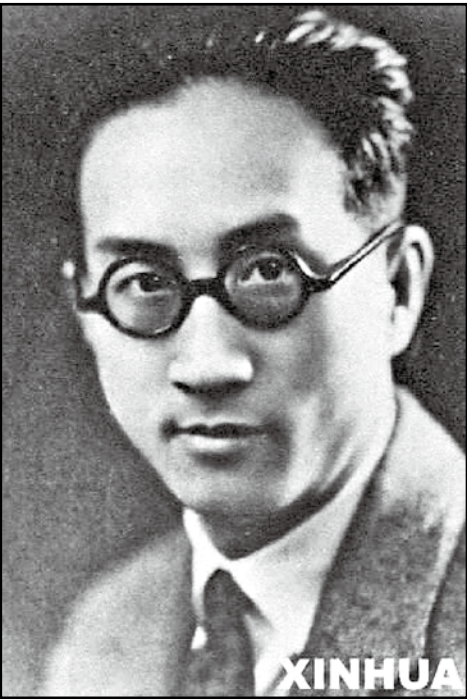
雖然，大陸中央近幾年來一直在為住宅問題苦惱，陸續提出許多辦法，例如推出保障性住房政策〈廉租房、經濟適用房〉，企圖解決低收入戶的住房困難；嚴格土地出讓政策，對已標出土地限制開發期限，藉此防止建商儲地炒作或盲目搶地哄抬價格，並嚴格監控貸款資金用來炒房炒股。2009年底，國務院更提出，國家最終的目標是希望2012年可以解決1540萬戶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難的問題。

就數字上來看，中央所推出的保障性住房政策，力度不可謂之不大，但是，如果這一系列的出台政策僅著眼於「調控房價」，環繞在住宅商品的供求關係，而忽略了從住宅問題的公共性——「居住權」入手，在高收入的城市居民普遍追逐「第二套房」、甚至「第三套房」來作為致富手段的今天，誰也不敢保證，假以時日國家大量的財政挹注所建設起來的「保障性住房」，會不會成為新一波社會剩餘資本炒作的對象？台灣一轉手動輒台幣千萬的「國民住宅」，就是一個典型的失敗範例。



江西省贛州市經濟適用房 劉紅攝

何其芳 報告文學縱橫談*



XINHUA

報告文學在中國，是有過轟轟烈烈的時候的。它隨抗日救亡之狂潮而興起，到抗戰爆發而達到頂點。那時候，書攤上擺著這類小冊子，雜誌上總有這一欄。那時候的作者，除了堅信「文藝與抗戰無關」的梁實秋們而外，恐怕很少沒有寫過這類文章吧。

然而，似乎在抗戰中的逆流襲來以後，報告文學也就下降了，消沉了。據說，大家不高興看報告文學了，大家高興看長篇小說了，看外國的古典作品了。這據說自然尚待調查。而文藝界的那一種雖然蕪雜，但卻生氣蓬勃的景象也就似乎不可復睹了。

到現在，連總結這一報告文學繁榮期的選集都找不到。難道真的一場轟轟烈烈，結果只是空空洞洞嗎？

需要話分兩頭。
抗戰後期這個舊中國的報告文學的消沉，這筆帳首先是要算到政治逆流的頭上的。蘇聯作家在蘇德戰爭中的文章，莫斯科是用電報打到世界各處去；而我們的作家所享受的特權，卻是檢查制度。人家可以在前方和後方自由地走來走去，而我們的作家卻只能逃往香港。

在只能就說誑與沉默兩者來選擇的時候，沉默也是好的。
但不要慢慢地滿足於沉默或與沉默差不多的「今天天氣哈哈」吧。……流於異民族手中的中國人民的血啊，無論什麼時候，你們都是有著神聖的權利來要求未死者們來忠實地記錄的！

1939年，我和幾個夥伴在河北前線。當一個做政治工作的同志向我們要求：「希望你

們三天能夠寫一篇通訊」，我們卻大大地嘲笑他不懂得藝術。於是我們說，藝術需要沉澱，藝術需要時間的隔離。於是我在前方9個月就只寫成了一篇報告。

未上前方的時候，我還不是充滿了熱忱的。就是初到前方的時候，我也還不是充滿了熱忱的。訪問、談話，晚上在魚燭光下整理材料，等等。然而只是用耳朵聽是不行的。需要全心全身到戰爭中去，到兵士中去，到老百姓中去。而我們卻是在作客。並且原來對於戰爭的幻想被戰爭的實際打破了。我原來希望碰到的是這樣的場面：我們的軍隊收復了一個城，於是我們就首先進去，看見了敵人的殘暴的痕跡，看見了被解放的人民的歡欣。總之，是這一類比較不平凡的事物。然而我們到了河北中部的平原上，卻碰上了敵人的大「掃蕩」。原來僅有的縣城都丟了。

一連20多個晚上的夜行軍。一倒在地上就可以睡著。有時候一邊走一邊打瞌睡，眼睛睜開時早晨的陽光已經代替了黑夜。砲聲和機關槍聲總是在兩翼的掩護部隊那裡響著。我們只是聽著戰鬥而沒有看見戰鬥。於是寫報告的熱忱就漸漸地消失了。為抗戰服務的熱忱也漸漸地低落了。於是，又想寫詩了，曾經想著這樣的句子，雖說沒有寫出來：

前方也還是有著寂寞的日子。
炮火聲中也還是有著寂寞的日子。

於是想，還是回去吧，在這裡簡直沒有什麼用處。
這証明了什麼呢？這証明就是寫報告文學也是需要深入生活的這又証明要深入一種新的生活，工農兵的生活，戰鬥的集體的生活，是並不容易的。首先得有認識與決心拔掉我們保衛自己的像長在刺蝟身上那樣的硬刺。這些硬刺，有時候它的名字叫藝術，有時候它的名字叫幻想，但是它還有別的難聽的名字，就是怯懦。

生活，深入的生活，廣闊的生活，對於寫什麼形式的文藝作品都是最重要的。報告文學自然不能例外。
假若說，抗戰初期的報告文學有一些今天還可讀的作品，原因首先在於那些作者進入了一定的生活。
假若說，抗戰初期的報告文學還有著顯著的弱點，原因也首先在於生活不足。
就我所閱讀的範圍來說，有兩類弱點：一類是以幻想代替真實。一類是形式主義傾向，以外國某些作品的花樣來填補其內容之不足。
第一類固然是由於沒有生活中的真貨，不得不以贗品充數。第二類又何嘗不是由於只在生活中獵取了一些零碎東西，不得不借助於外表的裝潢。

我們還有一個中國的讀者的問題。我們還有一個中國的文學傳統的問題。
寫作品，不是不需要匠心，不是不可以講求技巧。但這一切都應服從這樣一個原則：能使越多的讀者接受，理解，感動，就越好。歐美現代文學的形式主義傾向那樣濃厚，以至某些進步的作者也不能免，那是反映了今天歐美的作者與歐美的廣大人民還有著最嚴重的以至各種不同程度的脫節。在這點上，不應該我們去學他們，而應該他們來學我們。
這是說，正如新文藝的其他部門一樣，報告文學也需要中國化，大眾化。
我給報告文學重新下了這樣一個樸素的定義：報告文學者，記敘當前發生的事情之記事文也。

我的身體彷彿還一直感覺著這樣一個舊中國兵士的顫抖：

去年1月，我從重慶坐汽車北上，是過了廣元以後吧，有一個國民黨軍隊的軍官帶兩個兵士硬要搭我們的車。我們只有讓他們上來擠。那個穿著黃呢質軍服和狐皮大氅的軍官坐到前一輛車上去了，那兩個兵士就爬上來擠在我旁邊。當車子開行的時候，我就從緊挨著我的肩膀的那一位發現了他們在不住地發抖。迎車吹來的1月的風是很寒冷的。我們都穿上了棉制服，棉大衣。而這兩位兵士卻還穿著夏季的草綠色單制服。我問他：「你們還沒有發棉軍服嗎？」他說「去年發的穿壞啦，今年不發啦。」接著我想到那位穿狐皮大氅的軍官，我又問：「前面車上那位是你們的什麼官長？」他說：「連長。」這卻是我萬沒有想到的，看他穿得那樣神氣，我以為起碼是旅長團長呢。

也許有人說，這不過是很普通很平常的事情。但是，我卻一直不能忘記。而且，從這個士兵的顫抖不也就可以感到整個的舊社會的建築在顫抖嗎？

而重慶，只要在重慶的街上走走，也就可以給它畫一幅素描：

我最初到重慶的時候，我最聽不慣滿街「擦皮鞋，擦皮鞋」的聲音。好幾年了，我不曾有過這樣的心情：我突然記起了果戈理的一句話，「俄羅斯是憂鬱的」，而且深深地懂得了這種憂鬱。有一天，我往精神堡壘附近過，就在一條街的人行道上，整齊地坐著一排大小差不多襠襖的、灰色的孩子。一共2、30個。這是怎麼一回事？我望著他們，我想不通。我想，在這個國家，什麼稀奇古怪的事情不可能有呢，於是我跑過去問他們。他們說：「人家在做喜事。」哦，都是討吃的。那是何等老實可愛的一群孩子啊，簡直可以把他們編為一班小學生來上課，或者讓他們在有陽光的草地上遊戲。至於重慶的汽車站，有一個報紙的記者也注意到了，更成

了人間悲劇的展覽場所。小孩子牽著瞎眼的父親要錢。肚子大得快生小孩的女人要錢。母親抱著病得快死的小孩要錢。但最奇特的是最近有一個雨天，我看見一個赤腳襪襖的人拿著幾枝毛筆在都郵街車站兜賣，走過去，走過來，把兩枝取了筆帽的白色的筆高舉在黃昏的暗色裡，喊著，「50塊錢！50塊錢！」現在50塊錢能做啥子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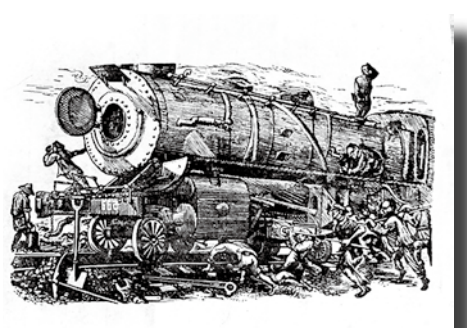
我提到這些，是想說明在這個地獄裡，有無數可以寫的東西。這些，還不過是地獄最表面一層的慘淡的景象。在這些底下，再走進去，將絕不是任何過去的殘酷的作家或者偉大的作家所能想像得到的呢。何況現在正當這個地獄在劇烈地震動的時候。

有能從這地獄的深處把那些呻吟和掙扎，血跡和憤怒，罪惡和希望集中起來，變為貫日的長虹或致命的毒死的嗎？期之於吸苦難的乳汁長大者。期之於回到下層人民中去與他們共苦難者。

1946年11月27日深夜
*本文摘自上海海燕書店1950年3月出版的《關於現實主義》一書。

作者簡介

何其芳(1912-1977)，著名詩人、散文家、文學評論家。四川萬縣人。1935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系。
1938年去延安參加革命，在魯迅藝術文學院任教，並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魯藝文學院系主任、《新華日報》社長等職。解放初期，在馬列學院(後改名為中共中央高級黨校)任教，後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書記、《文學評論》主編等職。
何其芳的文學生涯，主要是寫詩、散文和評論，但也留下了不少優秀的報告文學作品，如《星火集》、《我歌唱延安》、《日本人的悲劇》、《在大青山》、《老百姓和軍隊》……等作品。
《報告文學縱橫談》是何其芳在重慶工作期間撰寫的一篇報告文學論文。在這篇論文中，他強調了深入生活對報告文學創作的重要性。何其芳的看法，反映了他對報告文學的一些獨到的見解，很有現實意義。



黃榮燦的木刻作品 搶救火車頭



文/曼曼萊

1.
台北之南，海拔5百米，面積5、6百公頃，約有一個永和鎮大小的山坡地，原來是茶園，早年被建設盤商整批低價買進，再以零售價賣出的模式，開發成一個別墅社區，三十年來已入住六、七百戶，其中住了幾戶不再務茶農的原住戶。一般人知曉的「富、貴、名人集散地」，即是。他們，包括股票上市的科技老闆和分紅幹部、歸國學人、當官和做過官的、歌星影星，從商的，個個都能叫得出名字；百分99.9在大陸、美、加三地重疊置產，日子總是忽而飛東，轉而飛西，嘴邊掛的一兒二女都在美國或加拿大就學，每逢假期都回來；有的已經成家，嫁娶老外，取得國籍，生了孩子，間及工作閃爍不答；而大人在安排孩子的學校和定居兩件事，幾乎不考慮就近、方便照顧的，也是他們生財賺錢的內地。

他們站立自家庭院賞景的時候，瞧見路過的鄰居，或外出散步的時候，或耳朵飄來熟悉的美語英文的時候，於是，有錢人巧遇有錢人的序幕拉開了。
雖然對方臉色表情不全然與期望相同，這裡終究是台灣，但是通常習慣成自然，立即「禮貌地」招呼起來：「嗨！你好！」、「嗨！你好！」。如果是初識，興致一來，或許做一個簡短的自我介紹，一次兩次三次的碰面，只要談得來，聊得有趣的一句接一句，百分之八、九十其中一方拋出美式問句：「我可以請你來家裡喝茶嗎？」正合他意，這個小週末，或週末，或星期天，如何？
三擇一，好個誠意的模樣。
有人赴約還帶來他的朋友和他的鄰居，哇，人數與相聚次數不斷以倍數成長，交友版圖八方擴張，讓人不得不聯想某些人——熟悉直銷作業的超級金鑽營業員，掛上他們的電話，幾秒之內，還得佩服他們樂此不疲、勇往直前的態度。

2.
這星期一連三天，李家、王家、邱家三家排定，輪流辦起宴客。受邀的有石家，還有沈家——雙薪上班族，五十來歲，沒有生

育，假日總看他們馬路閒晃著。全都是住了十幾年的老鄰居，除了新搬來的石家老夫老妻屬於退休人士，孩子大了，既不「遠遊」，亦不興四代同堂，表面上看來，他倆非常悠哉地度起好似餘日不多的短暫，那短暫好似分分秒秒的漫長，可是他倆心底清楚明白，年紀稍大，與年少鄰居三不五時一來一往地攪和，幾次想回絕，哪來那麼多時間！我們有事！我們最近很忙！我們要看書！我們要寫東西！……唉，雖然內心翻滾，嘴說不出一個字，不。

3.
張羅宴請的三家皆雇有家庭幫傭。不當主人，當客人的一定帶著他們的幫傭一起光臨，說，開玩笑的說，給主人增加人手，實際上解決了供給幫傭三餐的問題。吃飯時，一次增加兩位，主人讓她們三位擠在廚房，蹲著，一邊吃飯一邊看著主人與客人吃喝著。

有一天，王家夫婦倆，留美博士，在大學教書。他們雇請的露絲，菲律賓籍，聽說是大學生，告訴她的主人：那李家太太，家庭主婦，平日只做早晚兩餐，先生下班、孩子放學才做。中午一個人在家不下廚，給他們家幫傭的伊思緹吃冷飯的，很隨便，很少，不好，有時只給幾片餅乾。

王家，大約留美的比較愛管事？問起李家：「你怎麼可以這樣？怎麼只吃餅乾？」「誰說的？你看到了？」李太太心虛了。「我聽露絲說的。伊思緹親口告訴她的。」

「她亂說。以後不許她來。」
別人當八卦地傳來傳去，最後，嘔了，跑出電視廣告詞「女人啊，對自己好一點」：李太太啊，不外出逛街，不享受貴婦下午茶，中午只吃餅乾，你先生還是醫生呢！幫傭的伊思緹是否吃飽穿暖，沒人在意。

4.
輪到邱家做東，為上國中的女兒熱鬧慶生。李家和王家雖有不悅風波，好似啥事也沒發生，高高興興一家大小攜手同時抵達，只是教授夫婦沒帶幫傭來。
小壽星的父親，四十來歲，一米八，很壯，正值事業尖峰，經營一間小規模的室內

設計公司，有次說溜嘴了，25萬的廚具他報價50萬。眯眯小眼睛，上面架著一副寬邊黑色眼鏡，穿著「設計師」制服——尖領黑衫配牛仔褲，正和他們家的幫傭，矮小的阿霞，兩人扛著一個木頭長桌兩頭。他兩臂青筋，額頭冒汗，往屋後院子走去，沿著花園邊緣的山崖，一咕嚕地把它滑溜下去。他怎麼可以把他家不要的東西往崖邊丟棄？五百米的山崖，淵底是一條溪流，連著一片農地。

石老先生問他的老太太，不是我們兩家同時買的那室外長桌嗎？擦拭，擦拭，還能用呢，為什麼不愛了？八分新，為什麼丟棄？喲，人家有錢。太太娘家也是。不是逢年過節，平日，每星期，宅配給女兒女婿一箱箱的，不是鮑魚龍蝦螃蟹，就是鮭魚和鮪魚，今天海鮮義大利麵，明日鮑魚粥，一家人時刻想著、討論著：今天我們來吃個什麼好吃的呢。聽說爸爸只是南部鄉鎮公所的民政課的一個退休員工，怎能那麼多錢？怎能如此的花錢？

5.
女主人喊著「阿霞！阿霞！」，記得石老太太第一次聽她嚷叫嚷叫，回了頭，叫我？讓她有點尷尬，老太太名字也叫阿霞。這個少女阿霞，個子不到一米五，臉龐稚嫩，看起來才十七、八歲，實際年齡當然不止。聽見女主人的聲音，她立刻跑著進到屋裡。
三家的孩子都念相同的一所雙語中小學，與國外同名，聽說兩校結拜，台灣的中學可以直接進入美國的高中就讀。穿起米黃底紅黑線條的格子制服，不論高矮胖瘦，宛如公主王子。他們在花園跑上跳下，開始玩著「比劃猜字」遊戲，出題「媽媽」，胖小孩往臉上塗抹和耳後噴東西兩個小動作，啊，邱媽媽，一下子猜對了；可是教授之家的王家和醫生之家的李家的孩子，繃著臉，興趣缺缺。換個別的玩吧，大人說。

阿霞她，蹲在花園的一角，拔草，不在廚房幫忙。
原來女主人叫她看著爐上滾了的鮑魚粥，吩咐她不可以離開，不停地攪動，結果被男主人喊走，把長桌丟得老遠老遠才回來，粥糊了，燉鍋燒壞了。
女主人吼著：「鍋子不能用了，這已經是第三個了！」。

她氣急敗壞：「你給我出去！」
6.
孩子要什麼給什麼的「全世界最好的媽媽」買了一個三層大蛋糕。
親愛的孩子，許願吧！
「我想要穿舌環，藍色水鑽的。」
「不行！神經病！」
「你不是要我們做厲害的事嘛。」
「小孩不懂事。」
「你當小孩時不也是不懂事。」

7.
阿霞蹲在花園的一角，認命地，低頭拔著草。附近鄰居時常看到邱家的幫傭在花園裡，一個人，安靜地蹲著，拔草，無論假日，或熱天正午。
像阿霞這樣來自東南亞鄉間的年輕女孩，心思非常單純，可能毫無料理家務的經驗，特別是，來到她們世界之外的另個截然不同的，可能是令她們目瞪口呆的「富貴」人家的荒謬的世界裡。只有經由人力仲介提供的幾堂課，簡單說明工作內容，教導如何洗衣、燙衣、做飯之類的家事，即刻將她們送上一個彷彿槍林彈雨的戰場。至於細節，關於洗衣，衣服質料與顏色的分類；燙衣，火力大小……，關於洗菜、做飯，不同民族，不同料理，主人一家大小不盡相同的口味，獲得歡心滿意，談何容易？如果遇到不知關心和體諒別人、高傲的、壞脾氣的、急躁的雇主，如果忽略了根本上的語言文化背景的不同，兩方都不好受。不管如何，幫傭的女孩，在陌生的地方，單擔低微卑下的勞動，雇主都應該首先為她們設身處地著想才對。

8.
阿霞蹲在花園裡，低著頭，認真地拔著草。她做錯了什麼？
「她把繡花的絲質內褲，進口的，一件好幾千，一定是燙壞了，怕我知道，不敢說。一定是往山腳下丟了。不然，我滿屋找，垃圾桶也找，怎找，找不到。」
那後院的陡峭的山，不就是邱家，石家老先生眼裡的奢侈之家，專用的垃圾筒嗎？